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信息导航

INFORMATION GUIDANCE

2010年第 1期 总第 12期

经济研究导航	10
理论研究	10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10
马克思竞争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10
从“过剩经济”到“债务经济”.....	10
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11
马克思恩格斯论所有制与阶级阶层的关系.....	11
论马克思东方社会土地制度理论.....	11
马克思基于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	12
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12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克鲁格曼模式”与“列宁模式”的比较与评析.....	12
企业边界稳定性问题研究.....	12
斯密价值理论辨析.....	13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经济治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贡献及启示.....	13
对经济学模型化的批判：结论隐藏在基本前提假设中——从一个效用函数导致不同的结果分析经济学模型化中的问题.....	14
数学推理方法与现代经济学的杜撰性质.....	14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全球合作框架思考——写在哥本哈根会议开幕之际.....	14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15
“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历史沉思及其在中国的实现.....	15
到底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兼与李惠斌同志商榷.....	15
国家特征、市场竞争与产业政策效率的决定.....	16
阶段定位 路径选择 体制变迁——中国经济学泰斗薛暮桥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16
企业管理	16
个人禀赋、制度环境与创业决策：一个实证研究.....	16
中国背景下变革型领导、组织承诺与离职意向关系研究.....	17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17
高管变更、继任来源与盈余管理.....	18
监督力与业绩共存于高管效用替代的机理分析.....	18

家族企业收益构成分析.....	18
中国国有企业 60 年：理论探索与政策演进.....	19
国有企业的政府控制权转让研究.....	19
运行环境危机对农村中小企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效应——对安徽凤阳、四川南部、广东三水区农村中小企业的问卷分析.....	20
虚拟组织中的知识创新与知识管理.....	20
企业信息化能力成熟度关键模型研究.....	20
国企整体上市中出资人监督机制应解决的几个问题.....	20
中国经济研究.....	21
从通缩到滞胀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1
中国工业资本收益效率和配置效率测算及分解.....	21
经济转型中的法治水平、政府行为与地区金融发展——来自中国的新证据.....	22
中国城市与农村基尼系数变动的分解研究.....	22
劳动力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国际竞争力变化——来自亚洲新兴国家的比较.....	22
制度内生、政府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分类检验.....	23
国有经济比重与我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省级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	23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	24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结构性转变与启示.....	24
中国经济发展中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研究.....	24
三农经济.....	25
分工、人力资本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	25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模式、问题与对策.....	25
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 32 个乡镇 67 个自然村的调研数据.....	26
农民消费综合模型的构建及实证检验.....	26
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的失地农民补偿问题研究.....	26
市场结构、风险决策与粮食安全——基于四川 20 个粮食主产县调查的实证研究与博弈分析.....	27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题.....	27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7
马克思人文关怀思想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27
论新中国 60 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的曲折历程.....	28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及其路径.....	28
思想政治教育效益的评价.....	2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影响力研究.....	29
和谐社会视阈中的公民素质.....	29
试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关联性.....	29
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民族认同.....	30
浅析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实现.....	30
超前化解矛盾纠纷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机制研究.....	31
中国共产党是重视学习和善于学习的政党.....	31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	31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内涵、意义及基本途径.....	32
建设学习型政党要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	32
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研究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33
胡锦涛“共建共享”思想的幸福意蕴探析.....	33
马克思主义研究	34
马克思民生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34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属性和实践经验.....	34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层次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三个阶段.....	34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面临的现实挑战.....	35
马克思恩格斯何以拒绝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平等的王国”.....	36
科学与价值:列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读.....	36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完善.....	3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37
民生: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新视角.....	37
从执政党的建设视角看 20 世纪 60 年代初全党调查研究.....	37

毛泽东关于党的干部思想建设的重要建树.....	37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形成的思想理论根源.....	38
从六个方面划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	38
科学发展观推进了人类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	38
中国改革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运用与发展——论邓小平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五大贡献.....	39
教育研究导航	39
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	39
2009年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	39
论教育场.....	43
教育政策平衡：性质反思与概念重组.....	44
教育公平：符号、工业化、“拟真”与乌托邦——一个“生存论教育公平观”的哲学批判框架.....	45
论比较教育学的知识形态与价值取向.....	45
中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改革：进展、问题与建议.....	46
思维型课堂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47
教育史研究	48
比较史学与中国的教育史研究.....	48
实践品性视域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	49
中国古代创新教育传统溯源.....	50
道教三洞学说及其在中古道教史上的影响.....	50
对话与理解：魏晋玄学清谈之教学意蕴解析.....	51
管理研究导航	52
管理科学与工程	52
基于WSR方法论的环境安全分析模型.....	52
Apriori算法对高技能人才市场工资价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52
领域本体自动构建研究.....	53
知识视角下一体化与反一体化决策的实证研究.....	53

跨层次视角下的组织知识涌现.....	53
企业知识创造机理的认知心理学新探.....	54
从不确定性看管理研究逻辑及和谐管理理论的启示.....	54
内外控人格特质的研究及其在管理中的应用.....	54
基于社会资本的知识链成员间相互信任产生机制的博弈分析.....	55
公共管理	55
政策能力与国家公共治理.....	55
基于网络媒介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传播仿真和管理对策研究.....	55
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变态势剖析与治理反思——基于上海的调查与思考.....	56
电子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测评模型及实证研究.....	56
行政管理	57
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	57
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多主体合作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57
影响地方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关系因素度量与分析.....	57
组织管理	58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激励框架探讨.....	58
基于知识网络的团队研发能力增长研究.....	58
团队心理授权、组织公民行为与团队主动性关系的实证研究.....	58
团队性绩效考核对知识共享的影响研究.....	59
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心智模式研究.....	59
临时团队中知识共享对快速信任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	59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框架模型.....	60
基于展望理论的情绪驱动忠诚的动态机制研究.....	60
科研管理	60
高校教师专利发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动机的中介作用.....	60
开放式创新下的占有制度：基于知识产权的探讨.....	61
基于研发项目生命周期的成本管理研究.....	61
基于著者同引分析的组织行为学研究知识地图绘制.....	62
绩效考核对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职业压力的中介作用.....	62

会议综述	62
大乱有大治?——如何治理美国金融体制	62
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要兼顾效率、公平和环保	63
域外观察	63
户籍改革成中国面临的政策难题	63
说中国不保护知识产权是一种误解	64
历史研究导航	66
古代史研究	66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性质探测	66
“山戎”名号考	66
唐代和亲公主的婚礼及家庭生活	66
意象与现实:宋代城市等级刍议	67
清代生员的进学年龄	67
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	67
近代史研究	68
晚清官派留德学生研究	68
自家宝藏的失而复得——晚清久佚唯识典籍由日本反传中国之影响	68
五四的社会后果:妇女财产权的确立	69
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69
文化史研究	69
中国历史上文化大变革论纲	69
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	70
寓乐于会:近代博览会与大众娱乐	70
“吃讲茶”:成都茶馆、袍哥与地方政治空间	70
文明话语与帝国文化——关于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参与劫掠北京的一场争论	71
从反省现代性到服膺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思想新论	71
孔子与美国排华高峰期华人的认同建构——以美国主要报纸为例	72
史学理论	72

“六经皆史”的视角:章学诚方志思想新论	72
历史意识的内涵、价值与形成途径	72
对中国当代史定义、分期、主线问题的再思考	73
研究综述	73
改革开放以来的明史研究	73
近 20 年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74
国内外羌族宗教文化研究评述	74
海外汉学	74
剑桥中国史：一场尚待完成的出版接力	74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据与科学——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	75
中国的科举制度是有价值的	76
考据学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引擎	79
“西学中源”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时代特征	81
体育研究导航	82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	82
我国体育消费研究进展与前景	82
对奥动遗产观的理性思考	83
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体系现存问题与对策	83
中国武术与韩国跆拳道比较	84
体育概念定义的辩证批判	84
新中国体育 60 年发展战略重点的变迁	85
二战后国际体育大发展对中国体育的启示	85
NBA 词汇的构词特征及其所折射的文化	86
关于建立奥林匹克学的思考	86
转型期我国社会体育利益整合机制研究	86
职业体育市场交易制度研究	87
现阶段影响我国城市青少年体育消费心理预期的因素分析	88
运动竞赛与训练学	88

我国男子健美运动员体能特征分析	88
北京奥运会中、欧男子篮球交锋过程若干技战术指标对比分析	89
我国少年体操运动员关节损伤及预防研究	89
学校体育学	90
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的现状分析	90
我国高校体育教学改革 30 年回顾与思考	90
学校体育“人本”教育生态的偏失及补偿研究	91
新形势下我国高校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模式研究	91
体育课程校本化实施成效及存在问题的研究	91
影响我国高校体育教学发展的因素及对策分析	92
美国健康体适能课程模式在我国普通高校的实验研究	92
“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专题	93
论体育强国的国际影响力	93
体育强国指标体系的创建	94
“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提出的由来与涵义的演进	95
我国群众体育由大到强的战略研究	95
关于体育强国战略若干问题的思考	96

经济研究导航

理论研究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作者：李其庆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1-5

马克思没有提出过完整、系统的危机理论，但是他对危机理论是十分重视的。马克思一直有系统研究危机理论的计划，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根源、特点、发生机制，危机对公认阶级的影响，经济危机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已经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只不过散见在他的许多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的一些政论文章中还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了大量实证研究。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加以梳理并系统化，同时结合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际材料发掘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竞争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作者：王永年，陈艳君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6-10

马克思经济学中竞争概念是指不同市场主体之间为获取更大经济利益而发生的经济比较。商品生产的条件就是竞争产生和存在的条件。竞争是社会生产关系系统外层规律和实现形式，它由该系统的内核，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决定。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并未进入“世界市场”的分析层面，因而该理论是为完成的。我们需要加强对社会主义竞争的特质及规律的研究，特别是应立足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格局的大视野，探究我国经济的竞争发展之道。

从“过剩经济”到“债务经济”

作者：陈英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11-16

“债务经济”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运行的新特征。“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以后，美元失去了黄金基础，促使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走上了金融化道路，也为“债

务经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发达经济从“过剩经济”向“债务经济”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货币发行量的失控和金融投机活动的猖獗，也不可避免地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作者：王志伟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1-5

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在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造成的，但表现为住房投资和生产的无限扩大与低收入者支付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冲突。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追逐利润和发财的狂热，金融创新对风险的分散与掩饰，人们心理预期的推波助澜，只是危机发生的重要条件。危机的导火索是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实践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危机理论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恩格斯论所有制与阶级阶层的关系

作者：胡建兰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6-11

所有制以及由它决定的阶级阶层结构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大理论，在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所有制结构和阶级阶层结构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又是历史范畴，所有制与阶级结构的发展演变最终取决于和服务于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所有制结构直接决定阶级阶层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又反作用于所有制结构。

论马克思东方社会土地制度理论

作者：邵彦敏，李双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12-16

土地制度是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的切入点。马克思通过对东方社会土地制度的研究，提出了东方土地所有制具有特殊的公私二重性，东方社会的“土地公有制”产生于公社制的社会基础之中，土地所有制是东方社会停滞的关键点等观点。马克思在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进行的探索，揭示了土地所有制为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提供了可能。

马克思基于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

作者：魏旭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55-59

肇始于亚当·斯密的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经杨格、加里·贝克尔和杨小凯等人的努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从分工与外部经理来解释报酬递增，从分工与外部经济理论来解释报酬递增，从分工导致制度变迁、组织创新与交易效率角度来解释报酬递增，以及从内生劳动分工、协调成本、知识总量和人力资本积累角度来解释报酬递增的分析框架，并没有真正解决分工导致报酬递增的真正根源，没有真正解决分工产生的内在原因、分工效率演进以及社会生产方式变迁所蕴含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等问题。马克思的基于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不仅系统地分析了分工和报酬递增产生的利益动机和历史原因，还提出了一个报酬递增导致资本主义内在演进的宏大理论，全面科学地解释了分工和报酬递增。

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作者：马怀礼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43-48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弱化警示我们：我们的研究或教学肯定出了问题。对照《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的研究内容会发现：我们没有能象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克鲁格曼模式”与“列宁模式”的比较与评析

作者：【日】大西广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17-21

对克鲁格曼的“列宁贸易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克鲁格曼误解了列宁理论的核心思想。这种误解源于资本收益递增的技术假定。列宁的不平衡性发展理论可以在资本收益递减的假定条件下对现实作出较合理解释。

企业边界稳定性问题研究

作者：王洋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27-31

企业边界的稳定性问题一直被企业家们所关注。科斯在经典文献《企业的性质》中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没有被后来的研究者们重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后续文献来看，基于科斯的观点，经济学家们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研究了企业边界的稳定性问题。从企业内部的研究是基于科斯的管理费用的角度，从企业外部的研究是基于科斯的交易费用的角度。

斯密价值理论辨析

作者：孔小红，管德华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49-54

斯密认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其等于当时该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所以，价值决定交换价值，劳动量是衡量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唯一正确的尺度；在资本主义社会，斯密坚持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的正确规定，把价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斯密从来没有混淆过交换价值和价值，也没有放弃过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理论，转而说三种收入决定价值。斯密理论的缺陷是没有劳动力和生产价格范畴，由此发生了一系列混淆。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经济治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及启示

作者：汪红梅，贺尊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22-26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以表彰他们在经济治理方面作出的贡献。奥斯特罗姆为公共资源管理和集体合作指出了一条可行路径；威廉姆森为企业的存在和企业边界的确定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和易于操作的研究方法。两人的研究提高了人们对非市场制度的理解，为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经济治理提供了合适的解决方案。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他们的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启示：政策制定要兼顾各方利益，因地制宜；要培育社会资本，强化民间组织的作用；要市场配置资源创造良好的条件；要认清企业边界的决定条件，合理调控企业规模。

对经济学模型化的批判：结论隐藏在基本前提假设中——从一个效用函数导致不同的结果分析经济学模型化中的问题

作者：张延

来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1期 38-44

文章通过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效用函数在三个经典模型——无限期界拉姆齐模型、戴蒙德世代交叠模型和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导致的不同结果，发现结果不同的关键原因在于基本前提假设的微小差异。说明经济学模型化的实质——结论隐藏在基本前提假设中。换句话说，数学推导是走过场，是一种精致的包装。前提假设决定结论。

数学推理方法与现代经济学的杜撰性质

作者：李卫华

来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1期 45-51

文章针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其理论内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对现代经济学假设条件及其思维程序的分析，并将科学研究的三种方法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现代经济学没有事实基础，只是一套凭空杜撰的理论。而数学推理只是用来杜撰理论的工具；经济社会“客观性”和经济学“科学性”幻觉的驱动以及经济学界生存竞争等使得现代经济学走向远离现实的空想境界；经济学正确的研究方法应该是观察经济社会这个天然实验室中真正的试验结果。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全球合作框架思考——写在哥本哈根会议开幕之际

作者：黄卫平

来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1期 12-18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地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74摄氏度，导致海平面在20世纪末加速上升。科学家提出证明，来自交通、工业和农业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及其他温室气体在大气中会阻碍热量释放，使全球温度上升，造成气候变化，带来干旱、洪水、海平面上升等潜在破坏。有鉴于此，文章通过建立一个全球合作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变得极为重要而且迫切。合作框架的设计不仅要尽量做到公平和公正，而且要考虑合作框架的便利性，降低实施

的难度，力争做到可持续、可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历史沉思及其在中国的实现

作者：蒋南平，帅晓林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38-42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始终是“经济学之谜”。近年来学者们对此提出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及其他资料公有加个人所有制论”、“共同占有的社会所有制论”、“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不分离的个人所有制论”以及“泛化的个人所有制论”均有重大商榷之处。应当重时代发展的全面性、“个人所有制”内涵的全面性、原文译法的全面性、研究方法的全面性、实践过程的全面性出发，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所指的“个人所有制”，是与公有制紧密联系的、动态的、实践的“个人所有制”，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形成的局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消费品个人所有制”。我国已经具有实现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时空条件及实践条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重建个人所有制”。

到底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兼与李惠斌同志商榷

作者：屈炳祥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43-47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产物，但要真正变为现实，仅有生产力的一定发展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狭义的）以及国际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尤其是在那些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够充分的国家；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得以建立的生产力水平在其量的要求上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它的伸缩性是很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诞生虽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它绝不是那种纯自然物的演化行为，而是一种能动的社会变革过程，因而它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并成熟起来，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才能实现。

国家特征、市场竞争与产业政策效率的决定

作者：孙早，王文

来源：《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1期 1-8

在已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国家产业政策是作为市场竞争的替代手段被广泛讨论的。文章进一步引入国家特征与社会结构两个概念，分析了转型国家产业政策效率的决定机制。一个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影响上有着鲜明特征的转型国家，在确立产业发展模式、甚至是国家发展道路时，通过政府投资和政府主导来实现追赶目标具有现实合理性；但同时亦有可能使国家被迫承受产业政策带来的诸如抑制市场竞争、政府被利益集团俘获等负效应，文章将之概括为“转型过程中的国家产业政策悖论”。文章的分析表明，在拥有一个“强大的、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相对集权）政府的前提下，“产业政策效率最大化”与“维持社会结构不变”两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只有通过坚定不移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才能保证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实践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阶段定位 路径选择 体制变迁——中国经济学泰斗薛暮桥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作者：杨欢进，杨柳婧

来源：《经济学家》2010年第1期 5-11

文章分作三部分介绍了薛暮桥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第一部分是“中国发展阶段定位：社会主义低级阶段论”；第二部分是“中国发展路径选择：现代化道路论”；第三部分是“中国发展制度保障：制度变迁论”。

企业管理

个人禀赋、制度环境与创业决策：一个实证研究

作者：杨其静，王宇锋

来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1期 68-73

文章通过研究发现，返乡者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可支配财富、教育程度等个人禀赋因素对创业决策有着重大影响；同时，政府的质量对返乡者的创业倾向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虽然上述因素的变化可在边际上大幅度影响返乡者选择自雇型创业的倾向，但对于其规模创业

倾向的影响要弱得多。上述实证结果表明,为了激励创业活动,政府首先应该减少腐败和提高办事效率,并充分认识到,自雇型创业而非规模型创业才是最有效的帮助对象。

中国背景下变革型领导、组织承诺与离职意向关系研究

作者:陈致中,张德

来源:《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1期 9-15

变革型领导是领导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在中国也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成果。但变革型领导至今仍是以西方为背景的概念,在中国背景下的实证研究尚嫌不足。因此,文章的研究首先采用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背景下的变革型领导量表进行修订和验证,通过信度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证实修订后的量表具备足够的信度和效度。继而,文章的研究针对480名企业员工进行了大样本的调查,证实了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的组织承诺有正向影响,对离职意向有负向影响;而在变革型领导对离职意向的影响机制中,组织承诺更起到了中介变量的作用。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者:任志刚,丁国荣

来源:《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1期 16-23

已有的公司治理文献主要是研究上市公司的绩效、治理结构以及投融资决策等问题,而对上市公司治理与技术效率关系的关注较少。文章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造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关系。文章的研究表明:第一,股权治理与公司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因行业而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是否有控股对公司技术效率的影响与行业特征有关;第二,债权治理与公司技术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公司偿债能力越强、融资能力越强,公司技术效率则越高;第三,董事会治理,即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董事长CEO的两职合一与公司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因公司所处行业以及公司自身特性而异;第四,经营管理层报酬与公司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经营管理层持股比例对公司技术效率的影响因行业而异;第五,公司控制权市场竞争和产品市场竞争有助于提高公司技术效率,法律基础及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的完善对于提高公司技术效率具有积极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文章还从公司治理视角就如何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技术效率提出了政策建议。

高管变更、继任来源与盈余管理

作者：杜兴强，周泽将

来源：《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1期 23-33

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历来是盈余管理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经验文献却相对较少。以中国资本市场 2001 年到 2006 年的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和高管的继任来源两个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之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变更导致了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外部继任者的上市公司相对于内部继任者的上市公司而言更倾向于进行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附加检验也揭示，高管离职的原因会给继任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带来不同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变更和继任来源是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为理解中国资本市场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监督力与业绩共存于高管效用替代的机理分析

作者：吴春雷等

来源：《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1期 34-40

国企高管能够获得过度的控制权收益，这是我国特有的现象。通过构造业绩与监督力的高管效用函数，对包含监督力与业绩的高管效用替代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在企业持续经营过程中，高管显性报酬对控制权收益具有替代的作用，并且该替代程度不同，激励的效果也有差异，较强的替代程度能导致较好的会计业绩；在替代过程中，对高管监督力的变化差异会导致替代程度的差异进而影响激励效果的差异，适度增强的监督力度将通过替代机理作用于激励效果，产生良好的会计业绩。建议我国国有企业在设计高管激励机制、以显性报酬替代控制权收益时，应充分重视和设计好监督力的变化幅度。

家族企业收益构成分析

作者：程书强，王珏帅

来源：《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1期 41-44

家族拥有企业的控制权使得家族企业的收益函数有着其特定的内涵，分析发现家族企业收益由企业收益和家族收益两部分组成，家族收益是难以度量的非货币形态的收益，包括：为家族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创业者中兴家业、光宗耀祖的成就感、在企业中指挥调拨他人的

满足感、附随于“企业家”头衔上的荣誉感以及一系列有幸或无形的社会网络资本等。家族收益衣服控制权而存在，是影响家族企业控制权转移的主要原因。

中国国有企业 60 年：理论探索与政策演进

作者：刘凤义

来源：《经济学家》2010年第1期 27-37

中国国有企业 60 年的理论探索和政策演进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前 30 年为第一个阶段，是国有企业建立和改革理论的萌芽阶段。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期，属于国有企业改革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理论探索是围绕“企业主体论”展开的，政策演进的主要内容是从“两步利改税”到承包制。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末期，属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这一阶段的理论探索是围绕“企业制度论”进行的，政策演变的主要内容是从股份制改造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四阶段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至今，属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面深化阶段，这一阶段的理论探索是围绕“企业产权论”争论的，政策演变的主要内容是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到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国有企业的政府控制权转让研究

作者：杨记军等

来源：《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69-82

文章以 2003-2007 年国有企业的股权转让数据为样本，考察了政府转让控制股权的决策及控制权转让后的短期市场反应和中长期业绩表现。研究发现：(1) 近几年来政府转让国有企业控制权的政治动机明显，而追求企业经营业绩的经济动机减弱，转让中倾向于保留规模大的和有战略意义的企业；(2) 市场对国有股权转让事件总体上给出了积极评价，但因投资者能理性预期到政府转让控制权的政治顾虑，民营化带来的短期累积超额回报并不明显高于其他转让方式；(3) 民营化确实提高了企业经营业绩，但终极控制权仍保留在政府内部的“换汤不换药”的控制权转让方式并没有显著改善企业业绩。尽管民营化带来了国企事后的业绩改善，但政府事前却因为政治顾虑而不存在把业绩不好的企业转让出去的明显倾向，这种逻辑不一致性折射出我国当前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困境。

运行环境危机对农村中小企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效应——对安徽凤阳、四川南部、广东三水区农村中小企业的问卷分析

作者：姜长云，刘明轩

来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1期 61-65

基于对三县农村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作者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运行环境危机对农村中小企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效应；以此为基础，得出对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的启示。

虚拟组织中的知识创新与知识管理

作者：冯新舟等

来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1期 66-72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加深，虚拟组织应运而生。虚拟组织中的知识创新从个人层面开始，通过个人——组织——组织间三个层面上主体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有效互动，实现知识的螺旋上升。为了推动虚拟组织中的知识创新，必须有效地进行知识管理，具体措施包括：共享知识远景规划，为知识创新建立多种领域，利用合伙人之间的多样性、冗余信息促进知识创新，建立信任和增大透明度，正确运用信息技术网络等。

企业信息化能力成熟度关键模型研究

作者：马慧，杨一平

来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1期 73-78

文章从企业信息化的战略角度，提出了企业信息化能力成熟度及其影响因素的模型体系。研究企业信息化的能力成熟度、测评的关键因素、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和防风险的措施。建立了多指标的企业信息化评价模型，并以定量数值表示评价结果，较完整地反映企业信息化的优劣水平，为目前企业进行信息化过程提供很有价值的参考方法。

国企整体上市中出资人监督机制应解决的几个问题

作者：万国华

来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1期 79-83

在我国企业制度转轨或并轨背景下，国有企业整体上市中出资人监督机制应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重构出资人监督机制以避免两种不同法律性质的监事会衔接的困难；外派监事将面临监督或负责对象、问责机制等变化带来的法律障碍及翰线进一步研究；外派监事会治理机制内生化的合理性及有效性；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之修改与完善也刻不容缓；如果要推进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直接持股实践，应尽快解决其法律地位和功能重新定位以及民商事主体意识和能力提高等问题。

中国经济研究

从通缩到滞胀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作者：胡春阳，鲍步云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22-26

传统 AD-AS 模型忽略了技术进步及通胀预期等变量对总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对现实缺乏足够的解释，必须引进这些变量来修正 AD-AS 模型。运用修正模型对中国当前需求和供给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短期内 GDP 将保持较快增长，CPI、PPI 也将回升，但必须警惕产能过剩，中国经济长期将面临较大的“滞胀”压力。

中国工业资本收益效率和配置效率测算及分解

作者：舒元等

来源：《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 27-35

文章利用 1999-2007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工业资本收益率，在此基础上基于“资本边际收益均一化”理论测算了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并利用“份额转换分析”方法对工业资本收益率进行行业间分解，结果显示：（1）中国的工业资本收益率在近十年内大幅提高，而资本在行业间的配置效率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变化很小。（2）中国工业部门资本收益率的增长是由于资本收益率自身的增长效应带来的。工业资本效率的改善更多体现在总量效率上，而投资结构缺乏效率。文章的发现对反思和探讨产业调控政策措施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经济转型中的法治水平、政府行为与地区金融发展——来自中国的新证据

作者：皮天雷

来源：《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 36-49

在以政府主导甚至干预经济发展为特征的转型经济中，政府行为会影响法治与金融发展间的作用机制。文章利用1995-2005年中国省级单位的数据研究了政府行为和法治水平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考虑政府行为这一制度因素时，法治水平的提高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这个效应有限。转型期政府行为对金融发展明显具有重要影响，地方政府的干预可能会对法治促进金融发展的作用产生部分“挤出效应”，甚至是完全的“替代效应”。文章的结论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只有在充分认识到政府行为主导金融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准确把握法治与金融发展间的关系。文章的研究也对主流“法与金融”文献提供了新证据。

中国城市与农村基尼系数变动的分解研究

作者：周兴，王芳

来源：《经济科学》2010年第1期 14-22

通过对1989-2006年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动进行分解我们发现：我国基尼系数的不断提高是由于收入增长的累进性对收入差距的负向效果被收入的流动性所抵消造成的。与城市相比，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累进性较高，其基尼系数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被收入增长的累进性抵消掉了，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累进性对缓解城市收入差距所起的作用却相对较小，因此，1989年以来农村基尼系数的增长幅度要抵御城市。

劳动力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国际竞争力变化——来自亚洲新兴国家的比较

作者：陈志昂，章丽琼

来源：《经济学家》2010年第1期 94-100

文章从劳动力全球化的视角，根据相对劳动成本平价模型，以美国为比较基准，选择东亚4国和印度为比较对象，对1991-2008年的6国相对劳动平价、实际汇率变动和对劳动

成本变动做了系列研究。研究表明,就全时期而言,中国的实际汇率与基期相比已处于升值状态,而其他发展中国家贬值程度扩大;分时期看,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中国具有相对劳动成本优势。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劳动成本优势持续下降。本次金融危机后,国际竞争力持续恶化。根据研究结果,认为人民币不具升值空间,保持汇率稳定是当前的最优策略。

制度内生、政府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分类检验

作者:王丽英,刘后平

来源:《经济学家》2010年第1期 20-26

文章根据我国产权制度和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征,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将制度和政府效率引入增长模型,分类检验了要素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数据分析表明,制度越完善,对经济增长越有利,但制度效应的发挥依赖于政府效率的高低。由于我国近十年来政府行政运行成本不断膨胀,政府效率不断降低,这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权制度与对外开放政策的发挥,降低了制度的促进作用。各省市区经济贡献的测算结果显示,物质资本的投入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对外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均产生了正的贡献;政府效率的低下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作用,同时技术进步对各省市区经济效率提高的影响差距较大。

国有经济比重与我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省级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

作者:李青原等

来源:《经济学家》2010年第1期 38-48

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等制度造成地方政府有较强保护本地区经济的动机,这种地方保护及市场分割造成的“诸侯经济”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类似于“跨国研究”设计框架的背景。以1999-2006年间我国30个地区2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运用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考察国有经济比重对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显示: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在省际和年度间呈现显著差异,且地区国有经济比重与其相应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负相关。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

来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1期 5-11

文章依据中国经济增长与价格形成理论模型以及 CMAFM 计量模型，分析与预测 2009-2010 年间中国经济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下的复苏过程。文章认为，中国需求管理应该继续采取扩张性政策取向，完成中国经济景气从萧条到繁荣的周期形态转换，并且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相适应，形式以促进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的政策架构。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结构性转变与启示

作者：张成思

来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1期 31-37

文章研究改革开放以来 30 年间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季度时序波动性特征。笔者将时变参数随机波动模型应用于离散型时序分析，并运用存在干扰系数情况下的内生断电检验方法来正确识别不同经济指标波动性特征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准确时间。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供给以及有效汇率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特征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均发生显著结构性转变，宏观政策的系统性改进是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发展中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研究

作者：王锋等

来源：《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123-136

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 CO₂ 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对有的放矢地制定减排政策，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运用对数平均 Divisia 指数分解法，把 1995-2007 年间中国能源消费的 CO₂ 排放增长率分解为 11 种驱动因素的加权贡献，并对这一时期中的 6 个时间段和每一种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 1995-2007 年间，中国 CO₂ 排放量年均增长 12.4% 的主要正向驱动因素为人均 GDP、交通工具数量、人口总量、经济结构、家庭平均年收入，其平均贡献分别为 15.82%、4.93%、1.28%、1.14% 和 1.11%，负向驱动因素为生产部门能源强度、交通工具平均运输线路长度、居民生活能源强度，其平均贡献分别为 -8.12%、-3.29% 和 -1.42%；(2) 人均 GDP 增长是 CO₂ 排放量增长

的最大驱动因素,中国的CO₂排放量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工业部门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深层原因可能是研发经费支出大幅提高所推动的技术进步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3)1997-1999年,中国CO₂排放量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工业部门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深层原因可能是研发经费支出大幅提高所推动的技术进步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4)生产部门能源强度下降是CO₂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降低生产部门的能源强度是实现CO₂减排的关键措施。

三农经济

分工、人力资本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

作者:焦志明,焦斌龙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39-42

在我国经济转型和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增收困难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民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分工存在一定的脱节,农民无法从现代分工中攫取足够的利润。但是,当前人力资本投资仍然是我国农村居民脱贫致富的必然选择,在投资方向上应主动以促进和适应社会分工发展为指向,在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上应做出适当调整。农民只有充分掌握专业化技能,使之嵌入高增加值的分工缓解,增收的难题才能真正得到破解。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模式、问题与对策

作者:杜朝晖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48-52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主要有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信用合作社、土地转包、城乡统筹等不同模式,它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存在法律缺失、制度不完善、组织不健全、政策力度不足等方面的问题。通过法律规范、制度创新、组织建设、政策支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对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 32 个乡镇 67 个自然村的调研数据

作者：唐娟莉等

来源：《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1期 110-116

文章的研究选取陕西省关中和陕北地区的 32 个乡镇 67 个自然村作为样本，基于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和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农民满意度的影响主要来自道路、基础教育、医疗、农田水利设施、饮水设施、政府信用度、生活垃圾处理、年龄、村务收支状况等；农民人均年收入、文化娱乐对农民满意度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农村清洁能源对农民满意度影响较小；农民满意度基本上不受被调查者性别、文化程度、家庭成员数等变量的影响；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而农民满意度根据其状况具有一定的次序性。

农民消费综合模型的构建及实证检验

作者：徐会奇等

来源：《经济科学》2010年第1期 23-33

目前的农民消费模型大都是基于某一特定视角展开，很好地说明了某一个或几个因素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关系和影响效果，然而，将各类影响因素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综合研究的文献并不多。为了能够更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各个因素对农民消费的综合影响，揭示农民消费行为的本质特征，文章试图综合考虑各类影响农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包含过度敏感性、消费短视、消费惯性和主观性等特征的综合模型，并对该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该理论模型对我国多因素影响下的农民消费行为有较强的解释力。

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的失地农民补偿问题研究

作者：林乐芬，葛扬

来源：《经济学家》2010年第1期 49-56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对最近一些年不断突出的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且对比分析对土地依赖程度存在差异的三个样本村失地农民对政府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市民化后的就业情况、城市适应状况、自身身份的认知度等，对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

后的福利变化进行系统研究。认为不仅要通过补偿解决农民失地后的生存问题,重要的是要从更为广阔的福利角度解决失地农民的发展问题。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必须纳入到农民福利改进的整体视角来研究。

市场结构、风险决策与粮食安全——基于四川 20 个粮食主产县调查的实证研究与博弈分析

作者:罗叶

来源:《经济学家》2010年第1期 57-66

基于四川 20 个粮食主产县 200 户农户、19 家龙头企业的调查发现,在农户+龙头企业+个体户的新市场结构中,国家粮食安全的微观经济基础已经转变为以订单为核心的粮油产业化。农户与龙头企业缺乏稳定的产业链合作机制,粮食订单履约效率低,提高了农户与企业对粮食生产经营的风险,从微观上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文章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龙头企业专用性投资和产品差异化的三方博弈模型,证实在通过粮食产业化重构国家粮食安全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农户与龙头企业的最优风险决策策略就是建立二次返利机制,可以显著提高优质专用粮油产品的履约率 and 市场价值,实现双方的利润最大化。同时,文章应用实际调研数据测度了市场主体的不同风险决策下对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差别幅度,从而从粮食市场供给的稳定和产品质量的保障两方面为国家粮食安全提出政策建议。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马克思人文关怀思想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作者:李春英

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年第2期,24-26页

马克思人文关怀思想表现为对人的需要、个性的尊重和重视,表现为对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执著追求:1、高扬人的主体性,把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2、揭示了人的本质,把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统一起来;3、重视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把人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充分挖掘、吸收和

弘扬马克思人文关怀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弘扬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展开的前提和保证。

论新中国 60 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的曲折历程

作者:邱仁富

来源:《求实》,2010年01期,77-80页

新中国 60 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曲折发展的阶段、拨乱反正阶段、快速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不同的历史阶段表征着不同内涵,昭示出 60 年来的艰辛历程。60 年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经验启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从政治化的角色中游离出来成为学科话语,必须注重话语实践到话语实践与话语经验并举、注重话语理论的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践的反思与批判、注重话语理论的自觉行动等。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及其路径

作者:盛跃明 孙其昂

来源:《求实》,2010年2期,71-75页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是思想政治教育为适应现代社会而进行的以实现自身现代化为目标、以科学化和人本化为特征的整体性的结构转变。外部环境改变、现时的党情社情、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困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现实依据。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路径为:转型社会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有用性的需求,这种价值关系范畴转化为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型的诉求,而功能的发挥最终又落实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转型。

思想政治教育效益的评价

作者:张方玉

来源:《求实》,2010年2期,76-82页

思想政治教育效益的缺失引发了一些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价值的质疑,也挫伤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思想政治教育效益的客观评价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和深思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效益评价的构建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效益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而细致入微的工作,需要注重的因素比较多,但只要抓着思想政治教育效益评

价的评价原则、评价标准和评价主体这些关键性要素,就能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效益、价值做出比较全面、科学的评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影响力研究

作者:周太山;石云霞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25-28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影响力是强劲的,牢牢掌握着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意识形态多样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影响力形成严重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多样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影响力的发展原则是必须在泛化和淡化之间把握好度,发展路径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解释力、说服力、论证力;坚持开放性,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亲和力、包容力、凝聚力;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关注民生,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感染力、感召力;加强战略思维,树立世界眼光,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渗透力、战斗力、竞争力。

和谐社会视阈中的公民素质

作者:王春英

来源:《求是》2010年第2期,29-34页

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素质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公民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构建和谐生活的主要力量。公民能否发挥有效作用的关键在于公民是否具备适应构建和谐生活的素质,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独立、理性、能够将权利和责任统一的现代公民的出现。本文着重于政治学的角度,从分析公民素质之于和谐生活的基础性作用出发,进而分析和谐社会中公民素质的基本内涵,将公民素质分为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主体自立意识、权责意识、规则意识、共赢意识和公德意识,后者主要包括政治认知能力、理科判断能力和理性沟通能力,最后提出和谐生活构建过程中公民素质养成的路径选择。

试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关联性

作者:祖嘉合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10年01期，12-16页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引领功能、利益整合功能、思想凝聚功能对增强构建和谐社会公信力、社会组织力、价值认同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增进对意识形态科学性的认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展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博大包容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亲和力等要求。

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民族认同

作者：兔平清

来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1期，1-7+21页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给世界各国、各民族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民族认同危机等问题,如国家认同意识的下降、族群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问题国际化等。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公平、合理、开放的社会结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从而促进各民族的社会整合、增强国家认同,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浅析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实现

作者：蔡丽华;黄永久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01期，152-155页

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前沿课题。研究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实现的有效途径不仅可以开阔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理论视野,也有助于培养社会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超前化解矛盾纠纷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作者：舒晓琴

来源：《求是》，2010年第2期，34-35页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切实维护群众权益”。这是对新形势下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出的新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着力抓小抓早抓苗头,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一、在第

一时间掌握各种矛盾纠纷变化的第一手资料；二、在第一现场构筑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三、在第一环节治理滋生各种矛盾纠纷的第一源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机制研究

作者：苏星海；赵丽华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10年01期，37-39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动力、基础、源泉、检验标准,以人民群众和党的领导集体为理论创新的主体,以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为经验基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思想渊源,以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形成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机制是上述多方面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和创新的机理、方式、形式和途径。

中国共产党是重视学习和善于学习的政党

作者：杨胜群

来源：《求是》2010年第2期，9-12页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一贯的优秀传统和宝贵的历史经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们党的优秀传统和建党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对于进一步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以学习立党；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三、学会建设新中国；四、重新学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

作者：张润枝；郑东升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01期，78-82页

与以往剥削阶级的价值观相比,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一个全新的价值观体系。中国共产党在价值目标、实现途径、价值主体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认

真分析、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问题,对于全面认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推动党的建设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内涵、意义及基本途径

作者:许青云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21-24+84页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个重大命题,是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这个命题包含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将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其基本途径可概括为,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以制度为保证,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以科学方法为引导,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此外,还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服务大局为根本,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建设学习型政党要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

来源:《光明日报》2009年12月30日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学习。只有搞通思想方法,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方面的具体知识。

一、重视思想方法是毛泽东为我们开创的一个好传统

毛泽东理论与实践活动的显著特点,是十分重视并且善于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都把解决思想方法问题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

二、改革开放以来每前进一步都得益于思想方法问题的科学解决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都是以解决思想方法问题为先导并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并在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实践中加以坚持。

三、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中要更加自觉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鲜明地提到我们面前,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由我们所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繁重的现代化建设任务所决定的。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要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辩证思维的能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研究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作者：石云霞

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年第2期，12-15页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研究对于深化“思想理论建设”的科学概念及其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确立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的认识、对于深化党的思想路线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十六大以来的创新发展的认识、对于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定位和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的认识、对于深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不断创新理论武装的方式方法，实现从“运动型”向“制度型”的转变的认识，建设学习型政党；归结起来就是，对于深化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的理论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胡锦涛“共建共享”思想的幸福意蕴探析

作者：陈湘舸；毕昌萍

来源：《求实》，2010年01期，13-17页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的思想。“共建共享”思想充分体现了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党对于全体人民幸福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它是新时代提升人的幸福感必须确立的价值取向,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我国全体社会成员应当大力倡导和牢固树立的幸福观。“共建”是人民幸福的基础和前提;“共享”是人民幸福的体现和核心;“共建”、“共享”两者的辩证统一是人民获得幸福的重要保障。“共建共享”思想对保证人民幸福的全面实现、社会的繁荣稳定、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民生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作者：王健

来源：《求实》，2010年01期，4-8页

蕴含在马克思文本中的民生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资源,经历了一个从隐到显的历史形成过程。"民生"是"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三个要素的统一。对当代中国而言,应坚持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统一,满足个人需要与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统一,从而使民生得以改善。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属性和实践经验

作者：张春莹; 平章起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10年01期，28-32页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十七大对新时期的理论宣传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进步的必要途径和重要手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三个鲜明特色,这就决定了大众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实践特征、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践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实现的,它是一个深刻的历史过程,有许多实践经验可以总结。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层次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三个阶段

作者：林志友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01期，15-18页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形成了自身的三个层次结构,即理念层次、制度层次和策略层次,这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结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从策略层面开始的,然后进入到制度层面,最后发展到理念层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也相应地经历了这一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逐步向前发展的过程,结合的路径大致经过借言赋意、耦合再造、溯本开新三个阶段。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面临的现实挑战

作者：刘志明

来源：《红旗文稿》，2010年03期，20-24页

一、关于“中国模式”问题之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成为世界范围内人们热议的话题。世界关于中国的议论，不乏友好善意的，也有居心叵测的，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类的言论。

西方关于“中国模式”的观点，归根到底就是他们重新提出中国道路姓“社”还是姓“资”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引导世界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是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要前提。

二、关于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之争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迅速而广泛地向前推进。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综合国力不断跃升，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因此，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赢家”之类的观点一时成了国内谈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影响的问题时的“主流”观点。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充满乐观情绪的“主流”观点，如果与“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比起来，只能说是“小道理”。

三、关于新自由主义变种问题之争

国内新自由主义的变种与国外大同小异，主要论调有这样几种：一是极端推崇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极力鼓吹“计划无效率”和“效率就是一切”，绝口不提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二是妄图废除公有制主体地位而极力兜售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公有制私有制都无关、是公民的普遍幸福的所谓“幸福社会主义论”；三是极力淡化国家经济安全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大谈特谈与国际尤其是西方接轨的所谓经济转轨论，宣扬西方的“民族国家过时论”和“全球治理论”等等。诸如此类的论调虽然千奇百怪，但万变不离其宗，最终都是在维护新自由主义“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三大核心理念。

因此，继续跟踪研究新自由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各种变种及其传播机理，“长流水、不断线”地揭露和批判各种改头换面的形形色色的新自由主义，是对我们党在新的历史征程中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出的新的历史任务，也是对我们党在今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经受住复杂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顺利实现党的十

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提出的新的时代要求。

四、关于“普世价值”问题之争

目前,国内对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一幅百家争鸣的景象。毋庸置疑,这一讨论,对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所谓“普世性”的价值观,对贬损和诬蔑我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以及主张“全盘西化”的观点和企图,作出了极为深刻的学理分析与批判。但是,“普世价值”的问题,绝非仅仅是一个学理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政治的高度,从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高度,辩证地研究和处理这一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何以拒绝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平等的王国”

作者:张国顺

来源:《求实》,2010年01期,70-73页

平等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追求和价值指向。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何以拒绝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平等的王国”呢?这是因为抽象的平等口号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而抽象的平等口号之所以不能充当这一角色,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主要是因为:(1)平等是一个旧口号;(2)平等是一个片面性的口号;(3)平等口号容易引起思想混乱;(4)有阐述平等问题更精确的方法,从而能更好地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

科学与价值:列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读

作者:方爱东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01期,35-39页

列宁坚持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主要体现在:在与经济派的斗争中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关注和追求;在由“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中对社会主义价值手段的再认识;晚年的“政治遗嘱”中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完善

作者:李红梅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72-76+82+86页

恩格斯晚年在批判资产阶级批评家和党内“青年派”思想家对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关系的歪曲和攻击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他在批判的过程中充分论证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科学化和系统化。同时,恩格斯晚年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它要求我们应当注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效互动、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与社会政策的协调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民生: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新视角

作者：肖冬梅; 柳礼泉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01期,109-113页

认识上的传统误区,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正确理解。从民生视角认识社会主义优越性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邓小平理论的整体高度来看,民生是邓小平社会主义优越观的基本角度,民生视角的采用使得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较之前人有了新的突破。

从执政党的建设视角看 20 世纪 60 年代初全党调查研究

作者：韩慈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01期,126-129页

20世纪60年代初的全党范围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是党执政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从执政党的建设视角研究这段历史,对探究党的执政规律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吃了大亏,更认识到必须要全面深入了解国情;其次,“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指导全党规模调查研究;最后,科学民主的执政决策机制和科学调查研究互为因果。

毛泽东关于党的干部思想建设的重要建树

作者：牛保良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01期，16-20页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程中,高度重视从思想上建党,努力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提出了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方法,坚决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形成的思想理论根源

作者：蒯大申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12-20+84页

制度是思想观念的外化。要深入了解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形成,须先考察其思想理论根源。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指导思想的确立,其次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基本认识,其核心是关于文化的功能定位问题,第三是关于文化与人民关系的认识,第四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地位、作用的认识。党对上述四个方面问题的认识,构成了党的基本文化思想和文化理论。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及其背后的基本文化理念在延安时期已臻成熟,延安时期形成的文化体制,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基本性质、基本特征和基本面貌。

从六个方面划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

作者：黄文忠; 傅尔基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43-47+85页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其他国家改革发展的实践,从经济制度的根本特性、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所有制结构的主体地位、平等竞争的发展关系和比较实践的效果检验等六个方面,就划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问题阐述看法。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无论是实行私有化,还是实行单一公有制,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或现实的“超越”。

科学发展观推进了人类发展理论的创新

作者：徐崇温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7-13+85页

把以人为本奉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化的发展理论；又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中，借鉴和超越了在三个方向上扩展发展理念的当代西方的新发展观；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实现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把可持续发展推向文明建设的高度。这就推进了人类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

中国改革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运用与发展——论邓小平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五大贡献

作者：庞元正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39-46+85-86页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具体运用于我国的实践，实事求是地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实现形式完全有可能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进一步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进而提出以革命性的改革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指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一场革命，注重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反作用，这就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五项重大贡献。

教育研究导航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9年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

作者：《教育研究》编辑部

来源：《教育研究》2010年第2期，P3-14

伴随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迈进，我国教育新的阶段性特征越发凸显，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亟待分析与破解。《教育研究》从十个方面对2009年我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进行了述评。（一）教育改革的方向和路径：（1）“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教育改革的方向。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兼顾人民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

过程。(2)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关键。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社会、学校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政府宏观管理、社会有效参与、学校自主办学的教育新体制,是教育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的必然选择,为此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为学有所教提供制度保障。(3)关于教育改革的方法与路径:有学者指出,教育改革要避免基于本质主义与二元对立的逻辑、立场与单向度思维方式,以免教育改革因“钟摆式”动荡而陷入困境。在教育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激进和保守两种改革倾向。激进改革主张采用颠覆性手段来实现改革目的;保守改革秉持教育发展的常态路线,主张平稳革新。有学者分析指出,根源于“有限理性”的渐进改革适合植根于中华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教育改革现实,具有激进和保守两种改革倾向不可比拟、不能超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渐进改革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改革;改革的力度是改革创新为主、继承传统为辅,以扬为主、以弃为辅;改革的路线是循序而改,改中有变,变必有果。

(二)教育公平的重点和实施策略:2009年,伴随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推进和深化,特别是针对长期形成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专家学者就教育公平的重点和实施策略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1)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有学者认为就教育结果定义而言,教育公平的本质并不是需要每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在学业成绩上完全的平等,而是将教育无法控制的那部分变量排除之后,只考虑教育系统自身的变量对学习成绩所造成的影响是平等的;有研究发现:教育对社会的贡献不单单体现为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它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作用,即作为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承载着促进社会流动、保证社会公平和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故国家在大力发展教育的同时,应该更加重视教育平等,创造更加平等的就业机会,最终促进社会公平。(2)教育公平的重点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有学者使用改革开放以来的有关数据测算中国的教育基尼系数发现:中国的教育平等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教育基尼系数整体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是在东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方面和区域内城乡教育方面仍存在不足。具体措施应着力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农村学生受公平教育;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农村学生受公平教育;缩小校际差距办好每一所学校;缩小群体差距教好每一名学生;建立促进教育公平的长效机制等。(3)教育公平的途径:科学规划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有学者指出,对区域教育改革模式的探索是区域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故需明确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整体目标,制定国家办学标准,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督导评估力度,建立教育监测体系。

(三)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方略:(1)深化基础教育改革,为创新型人才成长夯实基础。有学者介绍了钱学森的有关主张,一是改变只注重知识传授知识积累的传统教育方式,尽早引入抽象思维的教育;二是学会运用形象思维去解决抽象思维所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三是纠正学科分割与疏离的弊端,做到整体思维、专博结合;四是坚持学术民主,激活“集

体思维”。(2) 创新高等教育, 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大学教学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自由; 构建加强基础、重视跨学科的课程体系; 形成课堂学习的讨论、研习之风; 提高实践教育学术研究性。(3) 注重特殊人才培养, 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加强重点学科、创新平台、重点科研基地和实验室建设, 对特种专业人员进行特殊培养和指导。开发特需人才职业潜能, 制订特需人才职业生涯规划, 保证国家急需的特种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四) 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1) 加快高等教育改革。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 有学者提出了防范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思路。还有学者指出, 应通过制度创新, 充分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构建我国学生贷款的“反周期供给机制”, 以满足学生的贷款需求, 促进学生贷款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2) 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有学者指出, 应积极创办县城中等职业学校和职业中学,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 推行城市与农村对口支援、合作办学, 充分盘活大中城市的职教资源, 推行农村职业教育券制度, 通过多种措施加快农村职业教育发展。(3) 提升大学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有学者指出, 化解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的冲击, 应从劳动力市场和高等教育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入手, 设计战略性就业调控政策, 高校应积极调整专业方向, 优化专业结构, 加强就业的个性化指导, 提升学生就业能力。(4) 加强诚信教育, 培育大学生的健全人格。有学者指出, 应通过金融危机促使高等学校反思, 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与职业道德教育, 并引导学生理性对待金融危机的影响, 变压力为动力, 塑造健全人格。(五) 德育研究视野的新拓展。(1) 确立德育的追求和文化使命。有学者指出, 道德教育应该成为文化的检视者与开拓者, 有必要叩问文化路向, 展示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应该确立的主导性的文化追求和文化使命; 追索文化传统, 辨析多元文化的碰撞, 从现实文化生态的角度来分析学校道德教育的文化选择的困惑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 文化传统具有预制性功能, 可从根源性、特殊性和生存性的角度去理解; 有学者针对社会上盛行的网络文化现象指出, 应加强网络监管, 开辟未成年人专用网络, 以提高未成年人德育的实效性。(2) 走出功利主义的误区。有学者认为以“狼来了”为原型的道德故事所蕴涵的价值逻辑是功利主义的, 教育必须把唤醒和培育人们的同情心以及建立于其上的义务感和道德良知作为重要的社会目标加以追求; 还有学者指出, 要实现价值自觉的目标, 应明确道德价值与学生心灵衔接的机制, 以学生的自然性为出发点, 加深学生的价值自觉, 从而培育学生的道德主体性和个性。(3) 培育“有精神”的德性与“和谐心灵”的人。构建和谐的社会风气, 应促成制度德育与生活德育的融通, 让制度充满道德性与教化性, 使德育在生活中进行, 生活在德育中提升。(六) 探寻高等教育强国之路。(1)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意义与内涵。有学者认为, 高等教育强国的指标体系具体应包含五个方面: 一是规模指标: 毛入学率达到普及化(50%)或处于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阶段; 二是质量指标: 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

学,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学科专业和人才以及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成果;三是结构指标:高校类型齐全,区域布局合理,学科专业结构优化;四是投入指标:形成多元化经费投入体系;五是观念指标:具有在国际上公认的原创性教育理念和先进的管理理念,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七)发展学前教育的意义与举措。(1)学前教育是基础性事业,具有极高的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价值。有学者认为,学前教育的微观价值则体现在认知、培养道德、陶冶情操、保育身体等幼儿个体发展的显性价值和在园所实践中具体表现在幼儿个体的社会化、主体化、个性化三个方面的隐性价值。(2)普及与发展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健全学前教育发展的保障措施。有学者建议学前教师统一纳入国家教师资格管理系统,保障其与中小学教师享有同等的权利。(八)课程教学改革理想与现实。(1)课程改革的理想与现实。有学者提出,实施理想的课程必须尊重实践的教学可能性,要发掘课程与教学之间相向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张力趋向,探索它们之间的中间区域,使课程与教学改革行走在理想的课程与教学的可能性之间。也有学者提出以“可能性”、“操作性”、“匹配性”这三个标准作为主要指标,确立课程改革的“可行变革区”。(2)教学论的学科发展走向。有学者提出,以20世纪中国教学论发展作为教学论未来走向的立足点,由教学论“中国化”走向“中国式”教学论,从历史性、逻辑性、实践性和境界性四个层面推动中国教学论的发展,是提升教学论学术尊严和实现教学论学科价值的重要途径。(3)课程与教学要关注学生的整体性发展。有学者认为,目前的主体教学实践中存在着有效性低的问题,教学论界亦缺乏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基础教育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以生命活动的名义否弃了真正的生命活动,因而失去了学习者生命活动的支持。为此,必须突破旧有思维惯性的束缚,从研究怎样教到研究怎样不教,或曰实现从“仿生”到“靠生”的根本转变,以人为本,以生为本,把大自然所赐予的全部教育资源调动和发挥出来,为普及教育和培养人才服务。(九)中小学特色学校建设。(1)特色办学势在必行。有学者认为,每一所学校都是潜在的特色学校,应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2)学校特色与文化建设。从同质化发展到特色发展、从模仿发展到创新性发展,无疑是学校发展的基本轨迹。学校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素质、学校形象、师资力量等文化元素的竞争,所以每所学校都必须树立起极具有影响力的特色文化,以实现其发展目标。(3)特色办学的经验与方法。特色学校只有用高质量的特色课程做支撑才具有生命力。有学者认为,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益和增强人的活动自由度是学校特色发展的两大课题。学校特色发展就是要通过打造学校优质教育资源,来提高学校在教育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十)教育学研究的时代使命。(1)关注实践,服务教育发展。教育研究要摒弃“定义性”语言、逻辑、态度、方法和表达方式,避免过度诠释现象、非历史性诠释现象、非对象式诠释现象,摒弃绝对的

僵化的教条的研究结论。(2)立足国情,创新教育理论。有学者指出,教育理论本土化是本土教育实践的学术化,并从本土教育问题切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实现本土教育理论创新的过程。当下中国教育学的使命是,在研究思路上将国际理论视野和中国问题意识进行创造性的整合,在价值导向上从“知识世界”回归“人的世界”,在实践追求上以解决教育问题、影响教育决策为旨趣。(3)保持活力,做强教育科研。有学者指出,教育科研要进行创新,第一,要促进教育科研的文化自觉;第二,要构建教育科研的协作机制;第三,创建教育科研的学术标准,建立自己的“学科边界”;第四,发展教育科研的基础设施,为开展教育科研提供支撑与保障条件。今后我国教育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实证研究,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政策研究,提高决策服务的实效性;加强微观应用研究,强化指导学校管理实践的功能;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促进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加强比较研究的针对性和本土化,服务教育改革与发展。

论教育场

作者:李艳翎、张恒波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 P51-54

在教育史上一直就有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之争,为了协调二者间的矛盾,从提出“学校即社会”主张,到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再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综合素质教育观,人们对教育有了全新的认识;进而提出了时空统一、多维、动态的教育整体存在形态——教育场。不同的研究者依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不同的研究层面对教育场给予了不同的界定,大致分为(1)教育是某种空间,如具体空间类、抽象空间类、立体空间类、动态时空类4类;教育场是一种社会场,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内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及师生与其他人员互动的动态场域;(2)教育场是教育要素的综合体。学校教育是一个独立存在场,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通过各种教育媒介和教育活动的信息、能量的转换与增生的时空综合体;(3)教育场是动力场。教育“场”的动作按照行动研究法组织进行,真正做到多元一体化的研究性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实现群动、互动、连动效应,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出发对教育的各因素、各种力量进行整合形成教育合力;(4)教育场是物理场和心理场的结合体。即由教育物质提供的物理环境生成的“物理场”,由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即作为教育活动中“人”的因素而生成的心理场,以及二者之间与“物理场”共同作用而成的“情绪场”,它们共同构筑了教育活动中的“教育场”;(5)教育场是一个关系网络场域。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教育参与者相互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以知识生产、传承、传播和消费为依托,以人的发展、形成和提升为旨归的客观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是多元位置、多元关系、

多方矛盾的有形与无形的整体集合与各种力量的不断重组,是一个特定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6)教育场是一种教育环境。认为建立良好的教育场即建立良好的教育环境,校园文化是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这个文化主体和根基的局部环境;(7)教育场就是教育的全部信息集合。全息教育场研究者认为,教育场要反映物体在空间存在的整个情况的全部信息,小局部之中包含大整体的信息,注重整体,决不忽视局部,强调其关联性,力争做到教育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作者认为,教育场是“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介质和社会环境四者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相互交换而形成的时空统一的、多维的、动态的教育整体存在形态,具有立体间的多维性、整体上的包容性、主体间的动态性、以及约束、凝聚和激励功能。当代教育价值观的要义有三个特点:“全体”、“全程”和“全面”。从对教育场的评价对象看,力求“三观”兼顾,协调统一;从教育场评价的形式看,要“三评”齐下,即将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运动过程;从教育场的评价功能看,要力求“三性”合力,即要证价的评判性、导向性、激励性向教育的良性方向发展。

教育政策平衡：性质反思与概念重组

作者：蒋园园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P51-54。

自平衡理论被引入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以来,它的性质与概念一直受到推论依据的挑战。因为这个概念的使用往往意味着在一定的前提下,要与教育政策的利益关系和教育政策的价值倾向互协相连。目前在这一研究领域,有许多学者对于平衡什么仍然存在着一种普遍误解,作者认为,教育政策的平衡就衍生出了利用时机,克服障碍,以实现某个既定目标行动计划与策略等。以平衡作为化解教育政策冲突的一个重要手段,正是由于政策与利益平衡的统一性、价值因素的平衡性要求与能量释放平衡因素积极作用的结果。首先,利益“平衡性”决定了政策“平衡性”。教育政策必须以教育利益的平衡为结果要求,最终实现教育政策的动态平衡。其次,价值因素要求处理教育问题的平衡性。价值因素是指在处理教育利益冲突的过程中使教育利益之和最大化的条件,其本质意义在于,它能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解决实现教育中的问题和难题。再次,矛盾冲突的能量释放也含有平衡因素。由于平衡也是“自因、自果、自为、自在”的自我平衡,教育政策矛盾冲突不同因素之间具有可化约性,平衡因素驱使教育政策,在不平衡时极力趋向平衡,达到平衡则竭力保持平衡,后又伺机趋向新的平衡以至无穷。论文指出,教育政策平衡的含义,实际上是一个以教育事业均衡有序地发展为表,以教育公平为实的教育政策均衡状态。这种平衡态是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即经过适当平衡使除去成本的净效益达到最大化。从教育政策平衡的功能来看,平衡对政策

领域出现的各种利益矛盾进行调节所起的作用,是随着教育环境中的社会分层、社会关系形态、文化因素、社会生活的组合等的变化而变化的。不能把平衡当作教育政策的基本目标,需要在价值观念支配下对平衡的概念重组。作为教育政策协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教育政策平衡的确定涵义,就是坚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在教育政策主体的权利义务总体平衡基础上,通过一定方式实现教育政策价值取向诸要素的动态和谐。

教育公平：符号、工业化、“拟真”与乌托邦——一个“生存论教育公平观”的哲学批判框架

作者：李涛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期，P164-171

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中心主题，其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但目前，学界和政界普遍将教育公平仅仅当作促进社会稳定、维护法制规约、推进教育与保证民主权利的工具治理层面，而没有将教育公平看作是与人生存相同一的哲学价值层面，没有把教育公平深入理解为是与构建现代性生存——平等交往关系相一致的超越现代性异化的文化拯救途径，从而不自觉地陷入到了被勾勒抑或被幻觉的教育公平前见式框架之中，陷入到了与符号一致的教育公平改革的快餐消费之中，陷入到被资本和信息包围下的工业化与符码“拟真”化的教育公平虚幻构境之中，如何中拯救被蒙蔽的教育公平？在后形而上学式的教育乌托邦理想中建构起“生存论教育公平观”或许是教育公平摆脱彩绘化和狭义化理解的根本，而这自然离不开动态的理论追问和持续的哲学批判。作者认为，教育公平是一个需要永恒追问和不断批判的话题，这不仅在于教育公平总是“正在路上的教育公平”，还在于教育公平被作为现代社会理性的新基点而被置于“生存论”意义中来被理解，被作为现代人交往理性得以构筑和展开的原点来被理解，被作为摆脱现代性深层异化的可能途径来被理解，被作为现代人交往理性得以构筑和展开的原点来被理解，被作为摆脱现代性深层异化的可能途径来被理解。因此，教育公平的生存论哲学观在建构的同时更需要不断的自我超越，从而逃避西方的文化符码强制，自觉地将儒家“不欲勿施”的东方元素融入到教育公平的新秩序之中而使人们所无形接受，为社会现代生存秩序的新培育而作起点处的文化支撑。

论比较教育学的知识形态与价值取向

作者：陈时见、袁利平

来源：《教育研究》2010年第2期，P47-51

比较是比较教育学作为一门制度化学科的逻辑起点,从比较教育学本体生成逻辑来看,“比较”主要有四个层面的涵义,即一般性的思维方式(way of thinking)、具体的研究方法(method of study)、稳定的研究模式(approach of study)和独特的研究视域(perspective of study)。比较教育学的知识形态是由有一定逻辑联系的经验知识、技术知识和理论知识所组成的知识体系,它是比较教育学科的本质属性。比较教育学研究主体及其需求的复杂性和教育存在的多样性决定了比较教育学价值取向的多元性,这不仅决定着比较教育学科的生存根基与发展方向,而且从根本上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和意义世界。比较教育学特定的问题意识、价值追求和学术目标等,也都会直接影响到学业科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有效性。作者认为,恰恰是由于比较视域的存在,为整个教育研究的“生态环境”提供了一个重要“物种”,从而有利于不同教育研究门类互相取长补短,彼此促进,维护了教育研究的“生态平衡”,也使历经了近二百年的比较教育学科在新时代焕发青春活力、生成自我意识,并推动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无疑是我们理解比较教育学价值取向的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中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改革：进展、问题与建议

作者：孙志军、杜育红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P113-119

2001年以来,中国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第一,初步建立定向于公平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第二,以县为主、多级政府负担的义务教育财政责任体制不断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由主要采取各种工程性的专项转移支付,向主要采取定向于正常经费性质的转移支付过渡;第三,政府负担的增加和个人负担的降低,学杂费的逐步免除,使得我国义务教育真正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向“人民教育政府办”的转变;第四,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明显增长,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明显增长;第五,生均教育经费省际间相对差异在缩小。现阶段中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一,各级政府的负担责任,特别是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负担责任与负担方式还有待完善和加强;第二,地方政府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努力程度还有待提高,特别是县级政府在本地区学校之间资金分配的公平性上还有待改进;第三,中小学债务、非正规收费问题凸现出政府与学校的治理结构需要更为明确的制度和法律规定;第四,从全国层面来看,教育经费和办学条件上的地区差异还比较严重;第五,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实际运行中老问题的延伸与新问题的不断出现,说明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长效机制建立还处于初级阶段。作者在论文中就完善我国公共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的政策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确定基本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及实现其均等化是完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的基础;第二,确定基本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标准,首先应在

制度和政策层面对制定标准的原则、类型和涵盖范围给予明确的界定,其次是制定标准的基本方法,最后是对标准的具体测算;第三,深化学校预算改革与强化预算的约束性,积极推进定向于公平的县内学校拨款方式改革;第四,在现行财政体制与办学体制下建立财权与事权对等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第五,完善义务教育的监测与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各级政府义务教育投入努力程度、教育经费分配公平性、教育经费使用效率;第六,关于实现基本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均等化后的效率问题。就目前的经验来看,在学杂费取消的地方,如果学校没有其他资金来源,这部分由学校相对自主支配的经费被大大削弱,已对一些学校教师工作积极性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教育财政应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提供充足的经费,同时财政激励作为一种激励手段要对教育教学的质量产生影响。

思维型课堂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林崇德、胡卫平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P29-35

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核心活动是思维,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以聚焦思维结构的智力理论为基础,着眼于课堂教学中的思维活动,意在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包括认知冲突、自主建构、自我监控和应用迁移四个方面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明确课堂教学目标,突出知识形成过程,联系已有知识经验,重视非智力因素培养,训练思维品质以提高智力能力,创设良好教学情境,分层教学因材施教七个方面的课堂基本要求;同时,还强调了在教学活动中“双主体”的师生关系的重要性,倡导师生的课堂互动。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聚焦思维结构的智力理论是32年实践的结果,同时又有效指导着我们提出的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并在教学实践中得到检验。第一,历经32年的研究,提出并检验了思维品质是发展智力和能力的突破口,概括能力的培养是发展智力的基础,学科能力的发展是智力与能力发展的标志,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重视各种逻辑思维的发展,参加教育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师素质的重要途径等心理学观和教育观,同时,用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来指导课堂教学实践,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000多个实验班的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高(林崇德,1999,2009)第二,在最近在10年来,基于智力理论,胡卫平开发了旨在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学思维”活动课程(胡卫平,2008a,2008b)。该活动课程共有8册,分为形象思维篇、抽象思维篇和创造性思维篇三个部分。活动内容以系统的思维方法为主线,按照学生心理发展规律以及知识面的扩展而不断加深,由易到难、由简到繁。2003年至今,近200所中小学的20多万学生参加了实验,跟踪的结果表明,一般经过一年半到两年的实践,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力、学业成绩、自我效能、学习策略、学习动机、

自尊、创造性人格、社会性,以及教师的教学能力都等有明显的提高。

教育史研究

比较史学与中国的教育史研究

作者:郑刚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P77-80

比较史学是史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势。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教育史,是教育学科与历史学科的一门交叉学科,其发展无不深受历史科学的影响,并遵循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使用了比较方法并不等于就是比较史学,比较史学有整套相对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比较研究一般有五种类型: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宏观比较、微观比较和反事实比较。一般程序大致可分类五步:(1)确定研究对象的可比性;(2)分别对可比项的特征、过程、基本属性进行个案研究;(3)进行综合物比较,或比较其相似性,或比较其差异性;(4)提出有关历史进程的本质和规律的命题或假设;(5)验证假设的真实性并上升为理论。作者认为,学科间相互融合、借鉴已是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尤其是相邻学科间、交叉学科中这种发展特征更为明显。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摆脱教育史学科面临困境的现状,提升教育史学科的学术地位。首先,通过对各种教育历史现象的比较研究,察其异同,揭示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比较史学的功用在于,通过比较考察,探求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发生、发展与消亡的共同之理,探求各种历史现象发生与消亡的特殊规律,并进而探求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普遍规律。其次,有助于研究者开阔视野,从多种维度认识教育问题,拓宽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再次,有利于促进教育史研究史论的有机结合,提升教育史研究的学术水平。教育史研究既要克服空洞的理论化倾向,又要反对用对史料的分类、排比代替对历史规律探求的倾向。比较史学不仅要对各种历史现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行分类排比,还必须探讨造成那些异同点的原因及其影响,探寻各种历史现象出现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比较史学在教育史研究中运用的基本原则是:(1)自觉遵循历史的可比性原则。我们在教育史研究中所选择的比较对象必须在教育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史实且具有某种相似性,或是同一教育现象出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2)教育史实间的比较应是实质性,而不是现象的罗列。(3)应自觉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历史观就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整体性、根本性认识。科学的历史观可以保证人们在具体的比较研究中,能够自觉地从整体角度认识,防止片面和走向极端。

实践品性视域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

作者：刘来兵、周洪宇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年第1期，P1-10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科是彻头彻尾地反理论的。它思索的是实践，是对于实践的反思”。然而中国教育史学研究为了阐明教育发展的历史与规律，一直秉持的是以教育思想史与制度史取向为主的研究范式，注重精英思想与制度形成，对当代教育实践的变革缺乏足够的关注，忽视了教育中的人及其活动本身，以至于“教育活动的经验形态在可编码的修辞后的理论返回实践时，教育活动或经验本身就可能已经被遮蔽”。在这种研究范式下，教育史学的理论品性不断地得到彰显，却没有顾及到教育史学实践品性的发展，原本丰富、鲜活、充盈的教育世界被抽缩成干瘪的历史教条，被搭建成一具没有血肉的“实践骷髅”。实践品性视域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强调教育史研究在对当代教育生活的关注中理解教育变革的历程，重新确立人及其活动在教育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作者认为，关注当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实践立场的确立，意味着教育史学工作者应树立起敏锐的当代意识，积极关注当代的教育实践，进而多角度地建构整体的教育历史图景：既有政府颁行的教育政策、制度，也要有政策、制度之下的具体教育活动；既有教育决策者、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教育思想，也要有大众真实的教育生活体验。走向生活是当代中国教育史学的实践品性，意味着教育史研究视线的下移、研究范式的变革、表述方式和书写内容的更新。作为教育史工作者，就需要能走出书斋，走进不同阶层的教育活动的主体，“通过有关经验的故事、口述、现场观察、日记、访谈、自传或传记甚至书信及文献分析等，来逼近经验和实践本身”，以此来表达对这些不同的教育主体的生活意义的充分尊重。论文指出，教育口述史作为实践品性视域下教育史研究的一种形态，之所以正日益广泛地运用于教育史研究实践中，其原因是：（1）从学术功能上看，口述史料的“在场性”、“生活性”、“精神性”特征，可以更好地发挥“存史”与“释史”功能。其次，（2）从社会功能上看，口述史学可以满足社会对教育史的需要。口述史料可以与官方史料形成互补，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民间的声音，更好地服务现实；口述史可以将教育史学工作者从书斋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参与、服务与享受生活；口述作品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故事，融教育到生活之中，极富现实性和鲜活性，读来通俗易懂，具有大众教育的功能。在“关注当代”与“走向生活”的呼唤之下，口述史与教育史的结盟，有着十分重要的当代意义，将为当代教育史研究带来生活的气息，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史学的学科功能。

中国古代创新教育传统溯源

作者：孔春辉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P25-27

创新教育作为一种事实，可能与人类的教育是共时的；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自20世纪初期开始，就倍受中外学者的关注；作为一种教育思潮，也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出现过两次高峰。中华民族很早就开始倡导日新精神与生生之德。《尚书》中曾多次提到创新意识的重要性。“创新”一词出现在中文中，大约到了公元6世纪初，表达的主要是制度方面的革新和改造。社会的发展使“创新”这一词语的外延逐渐丰富，随着明中叶“百姓日用之学”进入教育范围和平民教育思潮的开启，随着西文自然科学的引进和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实学教育思潮的形成，随着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演进，“创新”一词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展，终于涵盖到科学、技术、知识、文化、教育、制度、理论等领域。生生不息之理落实到个体修养上，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发进取精神；落实到民族文化上，就是涵熔异质、兼容并包的整合理念；落实到治国安邦上，就是居安思危、生于忧患的预警意识；落实到政务管理上，就是革故鼎新、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古代教育家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采用了各辟蹊径的教学策略和方法，其中的一些方法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行结合等方法尤其受到历代教育家的频繁论及并运用，被后世教育家在验证的基础上增益和升华，作者认为，我国古代的教育中的创新主要是着眼于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的更好实现，着眼于人才知识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和现在社会全方位创新的内涵不可同日而语，但古代教育家承担各自的历史使命，在创新教育上所作的探索和努力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创新不已这一道路上不可磨灭的脚印。

道教三洞学说及其在中古道教史上的影响

作者：张泽洪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P65-71

刘宋道士陆修静奠定的“三洞”学说，是中古道教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问题。道教“三洞”学说产生于南朝道教改革的时代，是民间道教向神学宗教转化过程中的产物。该学说涉及道教神学理论诸多方面的问题。“三”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圣数，这种“三”为圣数的观念直接影响到道经的分类，道教以圣数“三”来构建和整理三洞道经，有以圣数“三”的崇高、神圣来表达宗经崇圣的寓意。道教教义思想的三元、三气、三天、三才、三宝、三清，甚至具有佛教色彩的三乘的借用，都是以“三”为圣数观念在道经撰写中的反映。道教以特

有的神授经书说造作三洞经书，以三洞学说为基础建构神仙体系和神灵信仰，并通过三洞学整合统一道教各派，进而形成以“三洞宗元”为信仰的经教体系。江南道教名派都以三洞经的传授，作为道法、道派传承的象征。在道教斋醮的科仪文书中，多有讽三洞之秘文，约三洞之玄科，启三洞之灵篇，按三洞之真科，依三洞镇禳之格等词文，可见陆修静总括提出的三洞经理论，对中古道教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话与理解：魏晋玄学清谈之教学意蕴解析

作者：张传燧、李学

来源：《教师教育研究》2010年第1期，P57-61

玄学是魏晋时期通过清谈深入探讨宇宙社会人生之本体的思潮和学说，对当时的文化、教育、艺术、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还与后世佛教、道教以及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一定关系。“玄学”就是探讨玄妙、深奥、幽远之学的学术思潮，以儒道两家思想为基本资料，以清谈和诠释儒道两家经典为基本表达形式，以宇宙、社会、人生万事万物存在之本体为主题，其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郭象、向秀等人。玄学萌芽于汉末魏初，形成于曹魏中期，兴盛于魏末晋初，流行于两晋南朝。“清谈”是玄谈家用来谈论学问、交流思想的一种基本形式，可分为多种情形。第一种是主宾双方相对，围绕某个主题，主执题宾诘难，两人相互辩论，一人评判；往返精苦，四座皆通。第二种是谈论者自为主宾，临时拈题，就题发挥。第三种是讲论者以独自讲论的“独白”形式进行。第四种是谈论者有时还是多个人参与同一主题的讨论。第一种清谈情形类似于现代辩论赛的正反双方。第二、三种即谈论者自为客主或独自论述方式，通常是单个人就某一问题反复剖析，其他人则作为听众或评判者。第四种情形类似于现代教学中的教师主导下的集体讨论形式。玄学清谈具有对话教学的某些特质，其思想及其实践与教学对话理论及其实践实际上都涉及到表达自我、宽容对方、理解话语、探寻意义，形成自我和完善人生的方式方法问题，体现认识（教学）主体的思想观点、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反映对认识过程的认识及对话的表现形式等内容，应被看成是对话教学的最早萌芽。近几年，随着西方对话理论及其教学对话思想被大量介绍到国内，出现了许多为对话而对话的不正常现象，甚至将有多少学生发言看作课堂教学成功的标志。教学对话的形式是自由的多种多样的问答式、参与式、交流式谈话，其实质是意义的理解、思想的交流、异见的包容、观念的生成和人格的提升。教师在课堂中即使没有提问、讨论等环节构成有声语言上的互动，只要他的讲授引导学生在真正参与知识意义的建构，教师和学生之间也是在进行着对话。对文字形态语言体系和他人讲授的接受、理解也可称之为隐性教学对话形态。对话教学或教学对话的一些基本理念及其做法

在魏晋玄学清谈中已经得到很好体现。晋玄学清谈启示我们,在教学中应该如何通过对话之“话语”以及表达话语的形神达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追求精神高尚和人格完美的目标,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教学对话的一些基本的思想意蕴和活动模式,而且还启示我们可以从传统思想中汲取教育的智慧。

管理研究导航

管理科学与工程

基于 WSR 方法论的环境安全分析模型

作者:张强,薛惠锋

来源:《中国软科学》2010年01期:165-174

基于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WSR方法论),建立环境安全的WSR三维分析模型,并对环境安全的物理(人-自然系统状态)、事理(环境安全预警)、人理(环境立法)进行深入探讨。为环境安全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为解决当前环境安全研究多视角、多领域的不一致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对新形势下保障国家环境安全实践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Apriori 算法对高技能人才市场工资价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作者:张仁寿,罗林开,叶凌君

来源:《中国软科学》2010年01期:158-164

本文以广东为例,运用Apriori算法对广东高技能人才市场工资价位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认为影响高技能人才市场工资价位的主要因素与工种、地区、学历、技能、工龄、年龄有关,其中工种对收入的影响比其它都要大的多,特别是在分地区的分析中尤为明显。

领域本体自动构建研究

作者：王磊，周宽久，仇鹏

来源：《情报学报》2010年29卷第1期：45-52

本体作为语义基础被广泛应用于信息检索、人工智能、语义网络和知识管理等领域。然而本体的构建和维护工作费时费力，影响了本体的广泛应用。因此，研究者们尝试利用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技术自动构建本体，提出诸多本体自动构建的理论和方法。本文在总结现存本体自动构建方法的同时深入研究了基于FCA (Formal Concept Analysis) 的本体自动构建方法，主要包括：基于PAT-Tree的统计分词，文档特征选择，基于文档-关键词的形式背景生成，最后用FCA构建本体。实验表明，基于FCA的本体构建方法明显提高了本体自动化的程度，构建的本体具有较好的可信度。

知识视角下一体化与反一体化决策的实证研究

作者：洪江涛

来源：《科学学研究》2010年01期：110-117

为了研究企业的长期竞争力，文章提出了一个关于业务活动一体化与反一体化决策的系统分析框架。从战略层面上，通过对业务活动过程进行分析，发现三种知识方面的因素影响一体化与反一体化决策。为此，以国内不同行业中的领先企业为调查对象，运用多项Logit回归的方法建立了有关决策的实证模型。在实证模型的预测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一个简化了的基于知识的概念决策模型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进行业务活动的一体化与反一体化决策。

跨层次视角下的组织知识涌现

作者：王凤彬，陈建勋

来源：《管理学报》2010年01期：17-23

在具体分析由低层到高层的知识组合与合成2类过程后，归纳了组织知识自下而上涌现的机理，得出了组织知识的涌现是不同层次上表现出的知识共享结构与知识生成结构有机结合之产物的结论。

企业知识创造机理的认知心理学新探

作者：高章存，汤书昆

来源：《管理学报》2010年01期：28-33

在对知识分类观点进行梳理、归纳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灰性知识的概念和知识三分法，指出灰性知识是知识创造过程的重要一环。针对目前企业知识创造理论模型的缺陷，提出了基于认知心理学视角的企业知识创造 IM CM 模型，并对此模型的一般过程进行了分析。

从不确定性看管理研究逻辑及和谐管理理论的启示

作者：席酉民，张晓军

来源：《管理学报》2010年01期：1-6

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组织管理面临着因果链无法追踪、整体性割裂和快速应变三大挑战。从组织管理应对不确定性的视角出发，结合对组织管理应对挑战的传统方法的解读，提出和谐管理应对不确定性的思路：以愿景和使命来应对组织目标的不确定性，同时降低因果链无法追踪的影响；以“和则”和“谐则”作为应对不确定性的2种互动机理，在保证效率的同时提高应变能力；以和谐主题和和谐耦合机制来应对组织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并提升整体性。最后，基于这一思想，提出未来的管理研究应注重愿景和使命的导引作用，和谐主题的合目的性整合作用，以及理性设计的有效实施与诱导演化主动应对互动耦合的支撑作用，特别是日益复杂多变环境下的组织领导人及其团队的作用。

内外控人格特质的研究及其在管理中的应用

作者：黄攸立，燕燕

来源：《管理学报》2010年01期：111-117

内外控人格特质是个体对其行为及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强化后的信念。内外控人格特质的不同不但影响个体对工作的态度，还影响着个体对组织的承诺感及满意度，从而影响到员工工作绩效和离职意图。通过对影响内外控人格特质的因素进行归纳，对目前常用的测量内外控人格特质的量表进行分类，并对内外控人格特质在管理中的应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内外控人格特质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较全面的概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5个方面的研究方向。

基于社会资本的知识链成员间相互信任产生机制的博弈分析

作者：王涛，顾新

来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年01期：76-80+122

以建立和发展过程为划分依据，依时间纬度可将知识链成员间相互信任关系划分为：尝试性信任、维持性信任和延续性信任。在知识链经历完整生命周期假设前提下，三类信任是动态演进的，并且不同阶段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从社会资本角度，通过博弈论的分析，得出知识链成员间相互信任的产生机制是“过程和规范”型。

公共管理

政策能力与国家公共治理

作者：顾建光

来源：《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01期：8-12+123

最近二三十年以来，由于市场经济放任模式一再出现危机以及失灵现象，国家公共政策能力问题摆到了政府和学者们的面前。政策能力成为当前各国政府关注的热点，也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然而，政策能力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国家能力、行政能力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它们之间既存在上下结构关系，又存在着相互的联动关系。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公共治理能力。不同国家对政策能力自然具有各自的评价标准，更应具有形成这方面能力的支持系统。论文对以上这些复杂的关系做一尝试性的梳理。

基于网络媒介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传播仿真和管理对策研究

作者：李志宏，王海燕，白雪

来源：《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01期：85-93+127

危机信息的健康传播在突发性公共危机管理中至关重要。为了研究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在网络环境中传播的特征，本文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指导，利用多主体建模方法，基于Repast平台模拟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在网络媒介中的传播过程。通过模型仿真我们发现突发

性公共危机在网络环境中传播的生命周期现象和群极化现象 ;并且分析比较了各主体属性在不同参数值下的演化结果 ,探寻危机信息传播的有效方法 ,为政府如何应对危机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以期有效控制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在网络环境的恶性传播。

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变态势剖析与治理反思——基于上海的调查与思考

作者：杨上广，王春兰

来源：《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01期：35-46+124-125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成为当代中国城市转型的主要特征。通过对上海人口、房地产等经济社会数据分析可知，当前上海人口、居住等社会空间正呈现剧烈的演变态势。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海未来社会空间将呈现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城市社会空间两极化、城乡结合部居住形态多元化、城市社会结构重构、城市“双城”现象凸显、弱势群体居住边缘化、城乡二元结构空间显现、城市部分社区老龄化等演变趋势。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变将带来类似西方城市居住隔离、空间剥夺、阶层矛盾、公共空间漠视等负效应。在“和谐社会”等治国理念下，反思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提出城市规划公共利益职能归位、加强房地产投资的引导与控制、推进市民利益维护机制建设、推进“以人为本”的混合型和谐社区建设、制定合理的人口容量战略、制定合理的人口分布战略等新型治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电子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测评模型及实证研究

作者：陆敬筠，仲伟俊，梅姝娥

来源：《情报学报》2010年29卷第1期：151-158

电子公共服务是信息社会中政府向公众传递公共服务的核心模式。公众是电子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应该成为电子公共服务的评价主体。公众满意度已成为当前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在对电子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美国顾客满意度模型 ACSI，提出了电子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的概念模型，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从政府网站、政府服务等方面入手，给出了概念模型中各个潜在变量的观测变量，设计了相应的调查方案收集数据，利用实证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得到了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路径图，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

行政管理

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

作者：唐文玉

来源：《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01期：13-19+123-124

关于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主要形成了三种权威解释模式，即公民社会、合作主义与行政吸纳社会。本文通过对一个乡镇基层文联成立与运作的个案研究，发现了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形态。对此，提出了“行政吸纳服务”的新解释模式，并把它与“公民社会”、“合作主义”以及“行政吸纳社会”分别开来。“行政吸纳服务”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融合，其核心互动机制是“支持”与“配合”。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中，国家占据主导性地位，社会依附于国家。“行政吸纳服务”的主要价值目标在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多主体合作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作者：姚引良，刘波，王少军，祖晓飞，汪应洛

来源：《中国软科学》2010年01期：138-149

网络治理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形式，如何使其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成为公共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国内外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及合作效果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多主体合作效果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并作相关假设，运用SEM验证主体、关系和环境因素对治理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的合作态度、合作能力和资源的投入对网络治理效果都会产生显著影响；参与网络合作的主体间信任和协同程度越好，效果也会越好；另外，环境因素中的上级支持和公众参与状况也会对治理效果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影响地方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关系因素度量与分析

作者：胡平，叶军，乔越

来源：《情报学报》2010年29卷第1期：128-135

本文在对我国地方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情况调查和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影响中国地方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三个关系因素：正式关系，非正式关系和利益关系。建立相应

的理论框架和假设,并对陕西省铜川市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根据得到的数据进行统计检验,选取小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初步确定各关系因素度量的因子构成,然后使用大样本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证明了理论框架以及关系因素度量因子结构的稳定性。并得出:信息依赖是最重要的正式关系,信任是最重要的非正式关系,收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关系。

组织管理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激励框架探讨

作者:寸晓刚

来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年01期:190-194

在以知识型员工呈显著增长态势的新经济时代,对员工的激励日益被认为是保持各类组织竞争优势的秘诀之一。自我决定理论(SDT)从内化的角度来分析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并详细描述了外在动机转化成类似内在动机的自发动机的机制,国外开始将其纳入工作激励研究的重点。在SDT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提出基于SDT的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激励框架。

基于知识网络的团队研发能力增长研究

作者:纪慧生,陆强;

来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年01期:178-183

研发能力的实质是蕴涵于其中的知识。在分析团队研发能力及知识网络的基础上,运用系统分析和推理演绎等方法,研究基于知识网络的团队研发能力增长过程,提出基于知识网络的团队研发能力增长模式,指出研发能力增长过程是知识协调的过程。

团队心理授权、组织公民行为与团队主动性关系的实证研究

作者:王国猛,郑全全,黎建新,文亮;

来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年01期:157-161

探讨团队心理授权对团队主动性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即团队心理授权是否会通过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作用对团队主动性产生影响。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差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

方法分析了团队心理授权、组织公民行为以及团队主动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样本来自于 32 家企业 156 个工作团队的 568 名员工。结果表明,团队心理授权对组织公民行为、团队主动性有正向影响;在不同心理授权模式下,团队主动性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团队心理授权在组织公民行为和团队主动性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团队性绩效考核对知识共享的影响研究

作者:常涛,廖建桥

来源:《科学学研究》2010年01期:118-126

探讨团队性绩效考核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及其过程。在影响个体合作行为决策的复合式模型与知识共享的个人内在动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团队性绩效考核对知识共享的影响模型和假设,并采用新兴的统计分析技术——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对 73 家企业中 234 个团队中的 813 名成员的有效调查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团队性绩效考核通过分配公平感对知识共享起到积极影响作用,而情境(任务相互依赖性、成员能力梯度)、信念(团队效能感、人际信任)、过程性动机(程序公平感、互动公平感)在该影响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最后,进一步对如何有效实施团队性绩效考核提出了对策建议。

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心智模式研究

作者:齐义山

来源:《中国科技论坛》2010年01期:122-127

心智模式是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之一,其通过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的态度与行为,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目前,知识型员工普遍存在的刚性创新导向型心智模式严重阻碍了创新行为的持续、有效性。因此,企业应通过创建良好的组织创新氛围、创新导向型组织文化、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员工心智模式的自我管理能力等途径,引导知识型员工培养成柔性创新导向型心智模式以达成理想的创新行为。

临时团队中知识共享对快速信任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

作者:秦开银,杜荣,李燕

来源:《管理学报》2010年01期:98-102+110

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提出临时团队的组建、快速信任、知识共享与临时团队绩效之间相关关系的理论框架,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临时团队中知识共享对快速信任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设计了由临时团队组建因素量表、快速信任量表、知识共享量表、绩效量表等构成的调查问卷,用 SPSS11.5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临时团队的组建因素分别与知识共享、快速信任呈显著正相关,临时团队的知识共享分别与快速信任、绩效呈显著正相关;知识共享具有调节作用,对临时团队的快速信任和绩效都有显著增强效果。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框架模型

作者:穆胜,龙勇

来源:《预测》2010年01期:35-41

由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组织绩效作用机制的路径复杂性,两者之间仍然处于黑箱状态。本文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研究中的技术争议进行厘清,并整合行为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智力资本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提出了 HRP 和 FP 的作用机制框架模型。重点明确了 HRP 到 FP 的过程中,个体能力生成组织能力的三大机制,为以后的实证研究给出了一种尝试的方向。

基于展望理论的情绪驱动忠诚的动态机制研究

作者:郑亚楠,周庭锐

来源:《软科学》2010年01期:121-125

区分四种不同交易情景,从理论上探讨了多次交易情境下顾客忠诚意愿的参考点移动问题。通过模拟每种情景下忠诚的形成及变化机制,建立了四种基于展望理论的情绪驱动忠诚的动态机制模型,其结果表明:在不同交易情景下,顾客正向/负向情绪落差导致的顾客忠诚意愿增/减量存在较大差异;顾客忠诚的变化量由于参考点的移动而呈现不同变化趋势。

科研管理

高校教师专利发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动机的中介作用

作者:赵文红,樊柳莹

来源：《科学学研究》2010年01期：33-39

随着近几年我国高校专利发明数量的快速发展,专利发明的影响因素研究也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本文将运用制度理论,对高校教师专利发明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支持机制与商业化程度是影响专利发明的主要因素,而资源拥有程度与教师个人科研能力是影响专利发明的次要因素,科研文化对专利发明的数量的影响并不明显;以上各种因素对专利发明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的动机作为中介实现的:个人回报对支持机制、商业化程度与专利发明结果间起到中介作用;研究支持对支持机制、资源拥有程度与专利发明结果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知识交流对资源拥有程度、个人科研能力与专利发明结果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最后,为提高高校的专利发明提出若干建议。

开放式创新下的占有制度：基于知识产权的探讨

作者：王睢

来源：《科研管理》2010年01期：153-159

对于创新企业而言,是否拥有知识产权并非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通过知识产权创造激励机制,高效利用知识而创造与获取价值。在开放式创新中,作为占有制度的重要内容,知识产权随着企业占有行为的转变而发生了演化。本文在对开放式创新下企业的占有行为转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关系性知识产权,并结合开放式创新的典型案例对其具体运用进行阐述,旨在回答企业如何灵活运用知识产权从开放式创新获利这一重要问题。这对于企业的开放式创新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基于研发项目生命周期的成本管理模式研究

作者：梁莱歆,熊艳

来源：《科研管理》2010年01期：170-176

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使得研发成本管理低效,本文将项目生命周期理论引入到研发成本管理中,通过分析研发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成本动因及其风险,探讨建立基于项目生命周期的成本管理模式。该管理模式将整个研发过程的成本管理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立项阶段的战略成本管理、先行开发阶段的风险成本管理、设计开发阶段的质量成本管理和工业试验阶段的目标成本管理。由此而使项目各阶段的成本管理重心更为明确,并将研发总体成本的不可控性转换为分阶段的重点可控,从而有利于企业研发成本管理效率的提高。

基于著者同引分析的组织行为学研究知识地图绘制

作者：路红，凌文铨，吴宇驹，黄丹丹

来源：《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年02期：140-144

从量化分析角度出发，选取了2000年到2005年间发表于核心期刊的524篇相关文献，以著者同引分析勾勒出相应的学科地图，揭示了当前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知识结构与研究现状。结果显示组织行为学研究的五大研究群体包括：心理契约研究群体，工作绩效研究群体，公平理论研究群体，组织承诺研究群体，以及其它各方向的研究群体。

绩效考核对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职业压力的中介作用

作者：顾远东，王勇明，彭纪生

来源：《管理学报》2010年01期：75-81

在中国高校全面实施校内岗位津贴及配套政策的情境下，探讨绩效考核对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大样本调查结果显示，绩效考核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有3条路径：绩效考核对工作满意度直接的积极影响；绩效考核通过职业压力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工作满意度；绩效考核通过考核认知的中介作用，影响职业压力，进而影响工作满意度，其中第1条路径的影响最强，第2条路径的影响相对较弱。高校教师这一职业存在高职业满意度、低薪酬满意度并存的现象。

会议综述

大乱有大治？——如何治理美国金融体制

日期：2010年3月15日

地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主讲人： 罗伯特·博森先生 (Robert Pozen)，MFS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讨论嘉宾： 祁斌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曹远征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执行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

通过透彻的分析，《大乱有大治》记录了美国金融体制的震荡，描述了金融机构如何像多米诺骨牌那样接连倒下，先是次贷危机的爆发，然后波及到股市、货币市场以及银行，再

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失策和国际保护主义的兴起。博森先生对证券化过程的改革提出了建议，评估了金融危机对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影响，评价了美国政府通过购买股票和不良资产来救助金融机构的措施。他指出，这些救助造成了“单程资本主义”，让纳税人承担了最多的损失，却获利最少。

目前，无论是美国财政部、国会和美国的商业领袖们还是 G20 国家，都需要将其关注焦点从昨天的错误转向现实的解决方法。而《大乱有大治？》一书勾画出改革的蓝图，给未来的经济稳定指出了道路。

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要兼顾效率、公平和环保

作者：张军扩

来源：2010年3月12日 国研网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任务。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实施，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有新的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有所提高；区域发展差距呈现缩小；地区合作进一步深化，统一市场建设继续推进。但总体来看，与新时期、新阶段的要求相比，区域差距大、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提高资源在区域空间上的配置效率仍面临不少障碍；生产力和人口空间布局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协调的问题依然存在。

域外观察

户籍改革成中国面临的政策难题

来源：《华尔街日报》2010年03月11日

将中国居民分成农村及城镇居民两大类的户籍登记制度已经成为了存于中国几十年来迅猛经济改革中的毒瘤。作为上世纪 50 年代计划经济的遗留物，户籍制度限制了国内劳动力的流动。除了引发民众怨气之外，户籍制度还助长了国内经济的长期失衡，这一局面正是中国领导人希望能够改变的。

当然，中国国内是有劳动力流动的：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城市人口数量平均每年都会增长约 1%。但是，较之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中国的城市化率仍在低位徘徊。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援引学术研究指出，基于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情况，应该有 56%

至 58% 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而现在的城市化率仅为 46%。

那些迁到城市的农村居民发现自己无法享受当地居民拥有的医疗、教育和住房补贴。这反过来也限制了这些新增居民的消费，因为他们还需要花钱购买其他基本服务。其结果是城市化进程本应创造的经济利益未能在中国得到充分体现。

户籍制度还限制了劳动力流动到他们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此外，亚洲开发银行(ADB)驻北京经济部门主管洛曼斯(Yolanda Fernandez Lommenis)说，降低城市化难度有助于避免浪费公共和私人投资。换言之，如果城市里的基础设施和房屋能够为更多的人所使用，那么相关投资就能得到更好的利用，而不至于浪费。政府担心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城市将使现有社会服务体系不堪重负。当地政府也担心安置更多的新增人口将花费过巨。

说中国不保护知识产权是一种误解

作者：白建民

来源：《华尔街日报》2010年2月17日

中国常常因未能保护知识产权而受到攻击，例证有仿冒奢侈品手袋，还有盗版影音产品等。谷歌(Google)上个月决定考虑是否退出中国，一个理由就是它所说的知识产权遭到窃取。但实际情况或许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糟糕。对外企来讲，关键是要理解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运作方式，并更加充分地利用已有的知识产权保护。

一个最常见的误解是，专利在中国没有用处。而实际上，专利法是一个迅猛发展的领域。2009年，中国知识产权局共授予专利权 58 万件，同比增长 41%。新专利申请量从 2002 年的 25.2 万件增加到 2009 年的 94.7 万件。中国知识产权局已是世界上除日本和美国以外最繁忙的专利机关。另外，中国在 2008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知识产权争端诉讼最多的国家，共起诉 24,406 件，比 2001 年增加了 4.6 倍。相比之下，美国 2009 年的诉讼量只有 8,000 件。

但外国公司让自己置身于这种法律手续之外。上述专利申请中，只有 10% 左右为外企申请；2008 年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中，外企为原告或被告的只有不到 5%。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相信，中国企业和外国竞争对手打官司时，中国的司法体制会对中国企业有利。2007 年，法国企业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被判因侵犯中国一项低压断路器专利，向中资企业正泰集团(Chint Group)赔付约 4,850 万美元。这肯定是中国历史上额度最高的专利侵权赔偿。2009 年 4 月，这起诉讼在上诉期间以约 2,400 万美元的赔偿金额和解。2008 年，另一家法庭判决三星(Samsung)因侵犯华立通信(Holley Communications)持有的一项手机专利，赔偿 740 万美元。

但外资公司也可以在中国法庭上赢得官司。2009 年 1 月，德国客车公司 Neoplan 胜诉

两家中国公司,获得300万美元的赔偿,原因是它的客车设计专利受到侵犯。这起案件代表着一家外国公司在中国获得侵权赔偿的最高金额,相比平均不到5万美元的专利侵权赔偿金额显得非常之高。上个月,北京一家法庭还判决两家中国公司向英国一家电热水壶组件生产商支付共计130万美元的赔偿。

经验证据表明,中国知识产权诉讼中,跨国企业近期的胜诉率超过一半。在部分城市,胜诉率超过九成。这些数据或许还不能据以宣告胜利,但它们意味着,认为跨国公司不能在中国打赢知识产权官司,是一种错误。

外资公司一定要知道怎样利用这些趋势。很多公司都犯了不在中国申请专利和商标的错误。外国专利和商标在中国是没有效力的,就如同中国专利和商标在美国没有效力。跨国企业还应该愿意对侵权者行使在中国注册的知识产权。而打赢官司,仅有起诉的意愿仍然不够。对中国司法制度和相关法条的深入了解,以及驾驭中国复杂法律与政策的能力,对于外资公司在华行使知识产权至关重要。

跨国公司还可以从中国几种积极的知识产权趋势中获益。其中一个趋势是,决策者越来越强调要建立一个有效运转的知识产权体制。国务院2008年发布了一个新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纲要》承认,积极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型经济体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去年中国的专利法做了第三次修改,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为了应对知识产权诉讼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局面,中国也在改革司法体制,包括完善管辖制度、考虑建立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法庭。

目前中国国内也有一股推动改善知识产权执法的力量,这就是中国自己的创新型企业。例如,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发布的统计资料,2008年,总部设在深圳的电信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成了递交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申请(为在其他国家申请专利奠定基础)最多的企业,超过了松下(Panasonic)、飞利浦(Phillips)、丰田(Toyota)和其他在过去高居榜首的跨国公司。华为等中国企业也会从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中获益,并且有可能为决策者施加强化整个知识产权体制的压力。

虽然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还存在某些问题,但跨国公司的运营应当基于这样的设想:中国是保护知识产权的,并在大张旗鼓地积累知识产权资源库。学会如何在体制内行事,比单纯祈求体制变好要更有效用。

历史研究导航

古代史研究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性质探测

作者：曹旅宁

来源：《史学月刊》2010年02期：29-33

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的秦简文献《编年记》，应当为墓主平日阅读的一种历史读物。至于其中的私家记事及秦王政(始皇)十一年以后的时事新闻，当为墓主标注，以备遗忘，类似后世的“记事珠”之类。因此，《编年记》不能算成喜的私家历史著述，而是当时通行历史读物的留存。这已得到新考古发现的强力证明。

“山戎”名号考

作者：李焕青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01期：77-81

“山戎”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古老称谓，和“崇山”习俗密切相关。而历史上北方各游牧部族如匈奴、东胡、蒙古，都有“崇山”习俗。所以“山戎”一词，应是对古代中国北方具有浓郁“崇山”习俗的各游牧部族的“泛称”。

唐代和亲公主的婚礼及家庭生活

作者：郭海文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01期：84-89

对唐代和亲公主的婚姻礼仪及家庭生活进行研究，一则可明晰婚姻礼仪的传承与变化；二则可扩大唐代历史研究的视野；三则从妇女史角度看，可见唐代公主的不同风貌。和亲公主的婚礼与一般公主婚礼相比，有了“悲壮”及“异域”的色彩。一般都要经过册公主、求婚、亲迎、送亲、改汉为胡等过程。和亲公主婚后一直处在屈辱、动荡不安的家庭生活之中，主要表现为嫁祖孙三代、殉葬、媵婚、被抢、被杀等。

意象与现实:宋代城市等级刍议

作者:包伟民

来源:《史学月刊》2010年01期:34-41

人口数量是反映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不少学者在论著中,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他们关于宋代城市等级的看法,研究思路都是通过广泛搜集文献记载中偶存的宋代城市人口数据的片断信息,归纳得出结论,但相互间歧见颇大。其实,宋人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表述更多地是出于意象,宋人的这种意象,与其说主要依据于实际人口数量,不如说依据于城市的行政地位,因此在时人意象中城市规模的差序格局就形成了都城百万家、路治十万家、州军与重要县城万家以及一般县城数千家这样几个等级分明的序列。这说明至少就某种程度而言,在两宋士人的心目中,城市的行政地位比它们的实际规模更为重要。讨论宋代城市发展史不应忽视这一史实。

清代生员的进学年龄

作者:左松涛

来源:《史学月刊》2010年01期:42-50

生员进学年龄的大小与科举制度运作、朝廷文教政策、传统教育风习及当地社会文化区域概貌等密切关联。目前学界对清代生员的进学年龄虽有估算,认为平均年龄在24岁,但存在取样偏少,局限特定时段、单一地域等问题。以近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所收清人年谱为依据,统计分析其中277位有确切记载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考取生员时的年龄,得到平均为19.72(虚)岁的结果。生员进学年龄比之前估算的要低得多,提示清代科举人口的数量应重新计算,也为今人对旧时中国教育普及程度的重新认识提供了重要旁证。

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

作者:谷川道雄,冯天瑜

来源:《史学月刊》2010年01期:110-115

《“封建”考论》引起的学术争论,展现出学界对“封建”名实问题及社会形态学说的不同理解。日本京都学派代表学者谷川道雄与《“封建”考论》作者冯天瑜就此展开对话,取得相近的认识,他们以为,将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教条

主义产物，不能谓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斯大林规定的“五形态”说出发，是论析中国前近代社会性质的健康起点；尊重马克思的封建观，恢复其本来面目，是正确对待马克思历史学说的首要前提，不应将马克思尖锐批评的泛化封建观强加到马克思头上。对“封建”概念的阐释和运用，应取古今演绎、东西涵化的正途。在精准概念与真确史实的相互观照中，显现中国前近代社会的非封建性及其与西欧、日本前近代社会的封建性之间的差异。

近代史研究

晚清官派留德学生研究

作者：徐健

来源：《史学集刊》2010年01期：72-79+112

留学政策是晚清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随着中德贸易和外交往来的开始，以及中国人对德国认识的逐步加深，清政府开始陆续向德国派遣留学生。1876-1911年的中国留德学生构成了这个时期中国留学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德学生主要来自湖北和江浙，他们在德国的学习以军事训练为主，但后来逐渐转向法律和自然科学等科目。留学生的管理对清政府来说是个难题。随着留学人数的增加，中德双方都在努力探索解决方案，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自家宝藏的失而复得——晚清久佚唯识典籍由日本反传中国之影响

作者：葛兆光

来源：《史学集刊》2010年01期：66-71

近代中国佛教史上，一个很引人注意的现象是晚清民初的唯识学复兴。唯识学复兴与中国已佚古唯识学典籍从日本传回有关，没有杨文会与日本南条文雄的联系，就没有这批典籍反传中国，没有这批唯识典籍，也不会有后来佛学取向的变化。不过，探究更深层的历史原因，则应该看到这与中国当时面临的危机有关。当时，西洋科学与哲学思想挟“进步”、“富强”之势影响东亚，中国士人与中国佛教必须回应西洋的科学与哲学，佛教必须拿出一些足以证明自己既比西方文化更适合于科学与技术、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又比西方基督教更适合拯救东方人的心灵的思想来，因而日本反传中国的唯识典籍，恰好给中国的知识界与佛教界提供了佛教对西洋科学与哲学回应和理解的资源，这使得佛教在晚清民初的中国思想世界

中，竟然成为理解各种外来新思想的一个途径。

五四的社会后果:妇女财产权的确立

作者：李长莉

来源：《史学月刊》2010年01期：101-109

五四时期形成了高涨的妇女解放思潮，但“男女平等”成为社会主导观念，最后在标举男女平权宗旨的国民党执政后，才最终修订颁行了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财产权的法律。这一法律条文比民间实际情况有所“超前”，因而效用性受到限制，但对社会观念及民间习俗变革起到了主导和引领作用。反映了观念、制度和习俗变革之间有一定的“超前”梯度，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的一个特点。

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作者：许纪霖

来源：《史学月刊》2010年02期：48-61

自进化论传入中国，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了一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富强之路。斯宾塞的竞争进化论，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的经世致用、法家的富国强兵相结合，形成了近代中国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狂潮。社会达尔文主义颠覆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礼的秩序，代之以竞争为核心的力的秩序，并产生了以强者为主导的新国民人格。然而，这一去价值、去伦理的力的秩序，在清末民初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它造就了民国，却毁了共和。五四知识分子痛定思痛，重新思考中国的复兴之路，开始了从富强到文明的历史转变。

文化史研究

中国历史上文化大变革论纲

作者：王晖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01期：34-40

中国历史上从古史传说时代的尧舜禹到清末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大变革有五个时期。一是尧舜到夏初时期制度、物质文化等方面的文化大变革。二是商周之际思想文化的大变革。三是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制度、物质、习俗文化的全面大变革。四是魏晋南北朝时代

思想文化的大变革,即佛教传入我国。五是清末民国时期思想、制度、物质、习俗文化的全面大变革。这些文化大变革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作用。

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

作者:周启荣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01期:5-17

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书籍市场可以从书价、印刷成本、藏书目录和存世刊本四方面入手。这四方面的研究切入点各有限制与特点,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必须合理使用这些信息,了解它们的局限性,以免导致不符合历史状况的结论。从少量的书籍价格资料和书籍刻印记录,我们可以大体计算出明后期的书籍价格范围与印刷成本。明代至少从万历时开始,中、下档次的新出的单册刊本价格大抵不会超过一两银子。在由一钱到一两这个价格范围内的书籍,读者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一两以下的书籍无论是富商官宦还是贫穷的士人抑或一般的工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刊本书籍已经成为一般百姓的消费品,书籍市场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教育的普及而不断扩大,同时刊本也流通全国。

寓教于会:近代博览会与大众娱乐

作者:马敏

来源:《史学月刊》2010年01期:91-100

近代博览会的兴起固然主要是源于商品经济与科技传播的需要,但大众娱乐文化又始终与各类博览会形影相随,成为其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大众娱乐是将博览会传播科技、文化功能与群众“找乐子”心态连接起来的最好形式之一,并使博览会能够吸引成千上万民众参与其中。近代中国举办的博览会充分借鉴了西方博览会的做法,加入了大量的娱乐活动,寓教于会,寓教于乐。大众娱乐活动不仅丰富了博览会的内涵,增强了博览会对大众的吸引力,而且使博览会本身成为研究近代城市大众文化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

“吃讲茶”:成都茶馆、袍哥与地方政治空间

作者:王笛

来源:《史学月刊》2010年02期:105-114

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成为袍哥的活动中心,他们在那里联络、聚集和开会,成为袍哥社

会网络的一个重要部分。袍哥在茶馆里活动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语言和行为，“摆茶碗阵”便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联络方法。茶馆作为地方政治空间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不过，“吃讲茶”仍然是最为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活动，这个实践显示了市民的相对自治状态，他们试图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说明一种国家之外社会力量的存在。

文明话语与帝国文化——关于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参与劫掠北京的一场争论

作者：刘青

来源：《史学集刊》2010年01期：38-46

1901年义和团战争以后，美国社会围绕传教士参与对华劫掠兴起了一场争论，对这场争论的考察揭示出无论是马克·吐温和一些反帝国主义者，还是美国海外传教团体，争论双方都利用了当时流行的文明话语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一文明话语为美国的扩张和海外非正式帝国的建立提供了支持和合法性，因而构成了一种帝国文化。

从反省现代性到服膺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思想新论

作者：郑师渠

来源：《史学集刊》2010年01期：80-88

欧战前后，中西方都各自面临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但是，因时代的落差，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热衷于以欧洲19世纪的文明为范本，猛烈批判传统文化之时，欧洲人却正致力于反省自己的资本主义文明。其反省现代性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并兴，不仅标志着西方现代思潮发生了深刻的变动，而且也给其时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虔诚地追随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到认同反省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再到信仰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这一共同的思想进路，既合乎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同时也集中代表和凸显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思潮变动的鲜明主线。他们最终归向马克思主义，既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善果，同时也是整个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中国的必然结果。

孔子与美国排华高峰期华人的认同建构——以美国主要报纸为例

作者：张涛

来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01期：23-31

通过美国数家主要报纸相关报道的深入剖析，本文拟全面展现孔子与华人认同建构的普遍联系。从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到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的排华高峰期。无处不在的歧视让在美华人陷入空前孤立，华人强化群体认同以彰显自己的存在变得尤为迫切，延续和强化孔子的文化核心地位成为极为关键的内部凝聚手段和群体外部特征，围绕孔子而产生的向心力是美国华人能够在排华高峰的逆境中生存下来的根本保证之一。

史学理论

“六经皆史”的视角：章学诚方志思想新论

作者：和卫国

来源：《中国地方志》2010年01期：16-23+3

章学诚以“志为史体”为前提，以“六经皆史”为根本，在自我追求学术“正统”的实践中，通过方志分立三书之法，实现了志与经的理论对接，建构起经、史、志的学术系谱，从而大大提升了方志的地位，凸显了方志编纂的意义，“六经皆史”与“志为史体”因此成为章学诚方志思想的两大理论支柱。以此为出发点，章学诚以道、器之说重塑了经、史与道的关系，实际将志也纳入了撰述以求道的器的范畴，由此确立了方志“明道”的终极功能和根本宗旨，修志明道成为其积极从事方志编纂的动力所在。此外，章学诚在定位“史义”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志义”的命题。在章学诚的理论话语中，“志义”与“史义”一样，秉承《春秋》事、文、义的有机结合，成为“道”在不同载体形式中的表现。“志义”的内涵要求方志不仅要具有思想性，更要求方志必须服务于“明道”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义”的双重要求。

历史意识的内涵、价值与形成途径

作者：徐兆仁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01期：108-114

历史意识是指人们由历史知识凝聚、升华而成的经验性心理、思维、观念和精神状态。历史意识的价值在于形成维系、强化群体组织的内聚力,建立起文化上、种族上的归属感,塑造民族的文化性格、民族意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历史思维能力和批判精神,激发探索与发现的学术动力,加深对现实社会活动的理解与把握。获得与形成历史意识的主要途径在于学习与运用历史背景性知识、连续性知识、差异性知识、求证性知识和反思性知识。

对中国当代史定义、分期、主线问题的再思考

作者:朱佳木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 01期:4-13+125

中国当代史的定义、分期和主线,是当代史学科建设中比较重要的三个问题,也是目前学界分歧较多的问题。在这几个问题上的反复思考,深入探讨,不断完善认识,对于构建当代史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当代史从学科意义上说,完全是中国现代史,但不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完全不是中共党史。对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史进行分期,只要是从历史本身的逻辑出发,各种意见都可以也应当平等讨论。但为了更大程度地体现当代史的特点,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的角度划分历史时期较为妥当。对历史主线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如果从历史发展主体的基本动因这个意义上理解,贯穿当代史的主线至少应有三条,即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的明史研究

作者:高寿仙

来源:《史学月刊》2010年 02期:5-28

改革开放以来,明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这首先表现为研究队伍日益扩大,论著数量空前增加。其次是思想解放不断深化、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对皇权政治、农民战争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评价变得越来越理性和客观。再次是研究方法日益多样,研究领域日益拓展,史学观念、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向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社会史的兴起尤其值得关注,不仅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对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研究也产生了深刻

的渗透和影响。尽管明史研究形势喜人,成就巨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如选题重复、内容肤浅、对国内外研究状况不够了解等。

近 20 年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郭震旦

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 01期:135-139

虽然后现代史学作为“姗姗来迟的不速之客”,一开始“在中国历史学家中并没有得到多少惠顾”,但随着后现代史学提出的问题越来越难以回避,进入新世纪以后,有关后现代史学的探讨逐渐显现沛然莫之能御之势。专题论文研究、系统的专书研究、大量西方后现代史学著作的译介是后现代史学输入的三个层面。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具有解构和重构两重意义,也意味着“全球化”趋势对中国历史研究影响的加深。“新社会史”的方兴未艾,标志着在世界史学大合唱中,中国史学已经在担任着一个声部的表演。

国内外羌族宗教文化研究评述

作者:邓宏烈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 01期:88-95

对羌族宗教文化以近代理论体系进行专门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民国时期的开创性研究,初步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前羌族保有的宗教文化的基本概貌和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该研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突破。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这段时期,羌族宗教文化研究可说是既充满活力又硕果累累,推动着该研究朝着忠实于羌族传统文化本质的方向发展。同时,对羌族地区特殊的宗教文化现象及其内涵、历史变迁,其与汉藏民族宗教文化之差异性与相似性的比较,尤其是对羌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羌族宗教祭司“释比”,还有待做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工作的进一步展开以及在实际中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大致确立了未来羌族宗教文化研究的基本方向。

海外汉学

剑桥中国史:一场尚待完成的出版接力

作者:燕舞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3-3

自 1985 年以降，“剑桥中国史” 25 年来引进和出版了绝大多数卷，一些本土学者似乎开始淡忘这套大书当年带给他们的新鲜和震撼之感。但这或许恰恰说明，他们在近 30 年里随着全球化学术和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而成长，也越来越摆脱全球学术共同体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王俊义对“剑桥中国史”用情最深，但他始终认为“中国毕竟是中国学赖以产生发展的本土”，“国内学者在吸收借鉴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首先应占有保存在本土的大量原始资料，同时还要吸收、消化、掌握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

北大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则称，《剑桥中国晚清史》乃至整个“剑桥中国史”“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外国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史料掌握和分析理解上存在颇多欠缺与不足的印象。此前一直在看《中国季刊》等着重刊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的刊物，就已发现国外学者在文献史料发掘和利用上，往往会晚于中国学者两三年的时间。读了‘剑桥民国史’和‘共和国史’，就更能看出这方面的问题来了。”

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也坦承，“我就读了一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而且是在 2000 年以后。沈志华去年 8 月出版了他主编的 3 卷本、110 万字的《一个国家的崛起与崩溃》，开拓性地重构了苏联 74 年的兴衰史。表面上看，由 22 位本土学者参与、涉及 28 个专题的《一个国家的崛起与崩溃》，有些类似“剑桥中国史”的集体性写作，但沈志华强调，“我们这个主要是案例研究，是在苏联史还没有深入、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做的”。

光阴荏苒，两三代人参与的“剑桥中国史”的出版接力仍在继续，“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下卷）”英文版目前已进入出版准备阶段，被翻译成中文应该也为时不远。“现在就剩下‘魏晋南北朝史’了，英文版也没出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任总编辑助理马晓光不知道“剑桥中国史”最终何时能成为“完璧”，王俊义和郭沂纹等人也都不能确定。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与素未谋面、万里之遥的异国天空下的剑桥出版社几代出版人一样，参与“剑桥中国史”的出版，一定是这几代中国出版人职业生涯中最为骄傲和幸福的记忆。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据与科学——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

作者：艾尔曼 褚国飞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2-29

本杰明·艾尔曼简介：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双聘教授，同时还担任普林斯顿东亚研究项目主任，主要教学及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思想文化史（1000—1900）、中国科学史（1600—1930）、中华帝国晚期教育史（1600—1850）等。

中国科举制度、考据学和近代科学发展史是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艾尔曼教授主张应该从文化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综合的角度来研究这类领域，他的这一研究主张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和关注。艾尔曼教授曾在代表作《晚清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一书中，叙述了科举制度从创立到终止的历程，是西方研究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的力作。在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科学问题时，艾尔曼教授避开了通常描述现代科学兴起过程时常有的“欧洲中心论”，把1600—1900年的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并分析了西学进入中国所经历的传入、调和与融合三个阶段，详细记述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衰变迁。

中国的科举制度是有价值的

激励人才的中国科举制度

记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制度中妨碍进步的一种，您是否赞同这种解读？

艾尔曼：虽然中国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了，这种传统却以另一种方式被传承下来。如今各个国家普遍设立考试制度，这是从以前的中国科举制度转变而来的。尽管其内容改变了，但它的技术、方法和规制都被延续了下来。从这个方面看，我不赞同科举制度是落后的这种观点，我认为它是进步的，只是到了清朝末年，大家都把它与清政府联系在一起，因为清政府是腐败的，所以与之有关的东西都要废除。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科举考试被废除后，考试制度还是得到了继承，如孙中山时期的考试院，实际上是把科举制度现代化了。以科举为主的考试制度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要多了解其作用，并给出它一个新的评论，而不是全盘否定，认定它没有价值。

中国在隋唐时期就开创性地设立了科举制度，当时考点仅设在洛阳和长安，所有的考生，不论贵族和平民都要去首都参加考试；在宋朝，考点的分布范围扩大到各省；到了明朝，又进一步扩大到每个县，当时中国共有1500个县设有考点；到了清朝，科举考试已经非常有影响力了。所以说，科举考试长期以来一直在发展。中国在很早就开始通过考试广纳人才，这用英文说是非常“precocious”（较早具备某种能力的）的，中国之外的学者们也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记者：您认为中国科举考试最大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艾尔曼：科举考试的目的是选拔人才，为政府筛选出最优秀的人来担任官职。但是到了宋明时期，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参加考试的人数太多，最后被选上的人非常少，后来甚至有90%以上的考生会被淘汰。一个淘汰率如此之高的制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大部分参加考试的人都失败了，这事实上说明了其制度本身也是失败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这么简单地看这一问题。因为这一制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虽然这些人才最后能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为数不多，但是客观上却在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懂语言、懂古文，能读会写，虽然很多人最终不能做官，但是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比如李时珍成了著名的中医，还有人当了教师，甚至还有很多人否认当初是为了科举而学习，最终研习佛学，皈依佛门，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使在元朝没有科举考试的时期，他们依然可以写戏剧和小说，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

记者：也就是说，社会向这些人传递了这么一个信息：即虽然参加科举考试失败了，但还有很多其他出路，因此这些人的自由度、活动空间和选择范围也就变得相当大。科举时代参加考试的人数占社会总人数的比重有多大？

艾尔曼：明朝的考生总共大概有200万，到了清朝增长了约一倍，达400万左右。虽然就全国总人数而言还是少数，但如果与其他国家比起来，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了。在这些考生中，明朝总共有25000人中了进士，清朝考中进士的人数与明朝差不多。最后被选中的不超过候选人数的5%，其他95%以上都要另谋出路，这是很有意思的。

科举考试在变化中不断丰富

记者：您认为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与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存在传承上的割裂吗？

艾尔曼：科举考试不是一成不变的，其考试科目一直在变化。在宋朝以前，隋唐时期考试科目偏重诗赋，可以写经义，但是还是文学比较多，以文为主。到了宋朝，开始看重其他科目，以经义为主，认为文章不应该只注重文学性，而更应注重经义。在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科举制度暂时被取消了，到了14、15世纪才又恢复起来。到了明朝，考试开始要写八股文，离开了诗赋。考官认为士子们要做官，其最好的学问应该与《四书》、《五经》有关，要与道德学有关，这才是主要的。士子们还是喜欢诗赋，但诗赋不再被列入科举科目中。到了乾隆时期，虽然依然考八股文，但是开始恢复诗赋，乾隆中叶，一方面要考《四书》、《五经》，但律诗也成为考试的内容之一。

此外，科举不仅仅只考诗赋或经义，策论一直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它与政治有关，涉及具体的问题如财政、经世等。策论考试形式可以追溯到汉朝，《汉书》记载，当时皇帝问了董仲舒一些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没有用笔和纸以文字的形式写下来，只是口头问答，但这

实际上就是策论。这种考试形式在隋唐宋明清都有，在科举考试第三场中举行。通过这些策论，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一些具体现象和问题。如章清先生与他的学生发现清朝末年的策论里有关于对待历史态度的问题，里面有很多争辩：历史是什么，春秋是榜样吗？还是以其他什么作为榜样呢？等等。策论被很多研究者忽略了，一提科举就是八股文或者诗赋，实际策论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记者：您刚才谈到，策论是在第三场考试中出现的，然而，大家往往注重第一场，对第二、第三场则不那么看重。

艾尔曼：但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忽略它的？宋明时期，第三场是很重要的，大家最后判断第一、二名，主要看其策论写得好不好。到了清朝，尤其是18世纪，由于考生人数太多，考生觉得考官对策论这些文章看不过来，而主要看八股、律诗这些内容，因为它们简短，而且以八股和律诗来判定名次。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场才逐渐被忽略了。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看，在汉朝的口试中以及历朝历代在首都的考试中，策论都是很重要的。宋明清都有策论，它是科举考试一直没有被取消的标准科目。现在大家发现，科举考试的内容很丰富，不仅仅是八股文。虽然正如你所说，清朝时策论被忽略了，但是一直到明朝末年，策论还是很受重视的，当时考生的答卷有4000字左右的篇幅，而考官也看得非常仔细，有很详细的评论。

记者：您说科举考试科目从隋唐偏重文学到后来逐渐改变，到了乾隆中叶后又开始恢复诗赋。这一系列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艾尔曼：这个很难说，一方面，满洲人对诗赋感兴趣；另一方面，从技术的角度看，八股文和律诗写的字不多，这样考官容易批阅。还有一点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清人认为宋朝以前的隋唐诗赋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提出要恢复以前的文字，即诗赋。

科举并非唯一的入仕途径

记者：在清朝，科举制度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是否是士人做官的唯一途径？

艾尔曼：不是这样的。清朝重兴科举制度，是基于对元明两朝历史经验的总结。元朝统治者一开始不愿意恢复科举，一直到1313年后才慢慢恢复，但规模很小。他们认为汉人不可靠，汉人可以在地方做官，但是不需要一个全国性的选拔制度。我们看一下数据就很清楚，元末之前100多年的时间里，进士人数一共才1100名左右，而宋朝一共有39000名左右，后来明朝与清朝也各有约25000名进士。到了明朝，汉人又恢复了科举，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人才做官的制度很重要。

清朝吸取了元朝和明朝的历史经验。满洲人认为元朝之所以没有成功、统治时间比较短，主要是由于没有和汉人合作，汉人没有很好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来。1645年满洲人入主中

原后，立即继承了明朝的科举考试制度，他们支持与汉族合作这种观点。但同时，他们还有翻译考试，既有满文翻译成汉文的，也有汉文翻译成满文的，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清朝最上层的官员不是通过科举入仕的，他们是通过宗族或者军功这些渠道。满洲人自己不一定通过科举途径做官，但是对这一制度本身，他们是非常支持的，他们赞同汉人一起参与统治。

当代的考试制度是一种新的选举方式

记者：结合您对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研究，您对当前的公务员考试有何看法？

艾尔曼：很多人都认为考试是一种好办法，这是一种新的选举方式。我个人不太喜欢考试，我自己上的课也不实行考试，而是让学生写文章。我觉得考试是一种制度、一种技术。为什么需要考试？因为参加的人太多，必须要有一种选拔机制，至于选拔的结果是否正确，这是另外的问题。在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中，选出来的人也不一定是最好的，甚至可能是没有用的，而真正好的人却没有被选上。所以批判的态度很重要。

中国科举考试的历史很长，里面的经验也很丰富，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教训。美国有人觉得大学入学考试不好，认为写一篇文章即可，那么这种文章是八股文吗？如果一个人考上了，其他人是不是要模仿他的文章？是不是大家都要写一样的？这样是不是成了新的八股文？所有这些都不是新问题。还有，考官作出评判也不容易，有10个学生可以用考试来判断，那1000个、10000个学生呢？

科举在技术上非常值得称道，虽然它不一定完善，但是在选拔人才的时候需要这个制度。而在教课的时候我认为不需要考试，因为这不是培养人才的最好方式，考试是把人才都当做对手，结果考得好的人不一定是聪明的人，只是他们更了解考试。比如有些中国人考GRE考得比我好，但是他们到了美国，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却不行。这就是考试制度的问题，中国人在历史上就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再比如，美国发现很多出身贫穷的孩子学习不好，究其原因，有家庭经济状况、文化差异和社会平等等因素。这一点，中国人在明朝初期就已经发现了，他们发现北方人考试成绩没有南方人好，于是就采取了配额的办法，40%的名额给北方人，60%的给南方人。在这些方面，中国人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考试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现在的考试是当代的选举制度，但同时也有局限性。

考据学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引擎

考据学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记者：考据学在中国科学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由此给中国近代科学带来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艾尔曼：考据学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它要求利用文献分析问题。在经典研究的问题上，考据学对证据的要求很严。考据学也重视天文学、算学等，将之列入研究范围之内，认为这可以辅助经学研究，这一点与程朱观念有所不同。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了西方天文学，也丰富了考据学的素材。

考据学对很多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当李时珍发现很多关于中药材的资料十分混乱甚至有很多是错误的，于是就重新整理出版了《本草纲目》。很多人与李时珍的想法相似，面对中医的很多资料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都发现它们存在一些版本、来历上的问题，如发现《黄帝内经》是汉朝写的医书，并不是出自黄帝之手。我认为，18世纪佛教、道教提倡整理自己的宗教经典，也是受了考据学的影响。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很好地了解考据学与佛学、道学之间的关系，我想他们之间是相关的，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潮流，不仅是儒学自身的一种现象。

考据学可以说是一种方法上的革命。人们用这个方法整理资料，追溯以前的思想。考据学最初的出发点和后来的结果不一样，学者本来是希望借此来恢复经典材料的真面目，但是从宋朝追溯到汉朝，汉朝追溯到周朝，最终追溯到哪里？圣人吗？问题是，圣人就是圣人、《五经》就是《五经》吗？大家想恢复历史真面目，但这一目的真的能实现吗？考据学分析是要复古，后来到了19-20世纪态度不一样了，不是复古而是疑古了。从复古到疑古，在内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从方法是延续的。中国的顾颉刚等学者，虽然是近代的知识分子、历史学家，但他们受考据思想的影响很大。我们要了解，18世纪的考据学是为了复古而非疑古，但问题是结果出乎意料，他们没有预料到，用他们的方法发现经不再是经，圣人不再是圣人。这一点我们现在用“后见之明”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当时并不理解。

记者：刚才您提到了西方传教士，很多学者认为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近代西方科学，这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您的上面对考据学的看法可以看出，您是提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科学发展这个问题，把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认为考据学的兴起、研究方法的革新，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真正原动力，而西方近代科学对其影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催化剂。

艾尔曼：对，科学在中国自古有之，后来受到西方影响并与西方科学结合起来。西方的自然科学，中国人解读为格物致知，认为西方人的格致与中国人的格致是一样的。那个时候西方传教士是天主教的，他们的知识还不是近代科学，而是用12世纪的希腊哲学来分析一些问题。例如他们有四元性的看法，用四元性来分析一些现象，这与中国的五行说有相似之处，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中西科学体系是可以协调的。中国人认为金、火是可靠的，西方人则认为水比较重要，对此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学术争辩。当然，我们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待

这些争论,知道他们其实都错了。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两者之间的沟通,他们探讨的不是近代科学而是当代科学,他们的教训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科学。我们现在对科学的定义,可能会在 100年或者 200年后被再次否定,每个时代都有其局限性。

天主教传教士之所以提倡与天文学、医学有关系的新学问,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知识在中国会受到欢迎。他们也曾到过其他的一些地方如日本,发现那里的人对这些知识不感兴趣。于是他们就想把这些知识教给中国人,以便赢得他们的尊敬,为传教活动创造便利。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战略。虽然传教士认为中国人对五行、阴阳、无极和太极的看法是不对的,但是他们也认为,为了与中国人交流、沟通,就要和他们辩论,并向他们传授西方的自然科学。所以当时西学与中学之间并不缺乏沟通。当时西方在政治军事方面并不强大,所以这种学术上的沟通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西方人不和中国人讨论、争辩,这些传教士就会被赶走,这与 19世纪完全不一样。因此可以说,面对最先传到中国的西方科学,中国是可以说不的,是有选择要或不要的自由。

19世纪,这一状况被改变了,那时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当时的西学已是另一种西学。而 18世纪耶稣会士与中国讨论的东西并不是现代科学,而是近代的自然学。当时西方也还没有科学,他们称作“scientia”,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综合的产物。中国人翻译成格致,认为这与中国的传统一样,是对“理”的认识。因此,耶稣会士与中国人的沟通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很有意义的事件。

“西学中原”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时代特征

记者:谈到中西文化的碰撞,明清之际的“西学中原”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艾尔曼:“西学中原”是指,有很多东西是从汉唐传到西域去的,如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都是通过阿拉伯传到西方,但西方人却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中国来的。后来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中国人发现他们带来的很多东西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只是以前没有注意。于是一些中国人提出,可以把他们再次恢复起来。比如钱大昕、戴震他们看了传教士的数学,发现这与中国的天文书等有关系。他们这种“恢复以前的”提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一方面,当新生事物来到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必然面临一个问题:中国人会接受吗?那么通过“西学中原”,接受起来就相对容易了。中国人需要改革,但是通过直接否认自己来学习西方的这条路径是走不通的,因此通过承认西方是进步的,但源头来自中国,这种迂回的方式可以使改革的阻力变小。所以这个说法自明朝末年到乾隆时期一直很流行。到 19世纪末,这种说法被日益放大,最后变成什么都是源于中国了。“democracy”(民主)是从《周礼》来的,“赛先生”和微积分也来自中国。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人们开始觉

得中国的“西学中源”是没有道理的，认为中国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西方的，这时观点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中日甲午战争是个转折点，之前很多人持有“西学中源”的观念，但之后的革命家、改良家就开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一概否定中国文化，认为中国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什么都不如西方。“西学中源”的出现及变化都有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反映了中国的自信心以及后来这种自信心在遭受列强挫败之后突然丧失的历史过程。

科学在科举考试中不占重要地位

记者：总体上，科学在科举制度中占有什么地位？

艾尔曼：科举制度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宋朝时候，虽然它是以程朱思想为主，但仍有很多算学方面的东西。但是到了明朝，在策论里面有很多内容与数学天文学等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到明朝末年发现日历不对，差了一两天，这样吉凶就都不准了，所以从策论中我们发现科举制度还是保留了自然科学的一些问题。这在清朝被延续下来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科举制度开始受到西方的影响，这时是可以把科学的内容放在科举考试里面的。到了义和团运动之后，即1901年后，科举制度又有了很大的改革，甚至可以说法义和团前后的科目发生了很大改变，此后科目新增了很多格致学方面的内容。因此，科目要是能被进一步改革的话，科学不但会被放进去，还会占很大比重。

1901年到1904年的科举有很多问题是与国家、世界政治有关的，最后才是《四书》、《五经》的问题，这时的科举已经被改良了，但是太晚了，那时大家觉得要全部废除。后来上海有格致书院，其考试都与科学有关。当时有很多人在江南制造局工作，他们利用格致书院的考试，通过文章比赛等写一些科学方面的东西，这些清朝末年的人中有很多在后来影响了学术界。但从总体上来说，科学在科举里处于二流、三流的地位，是不受重视甚至被边缘化的，虽然到了清朝末年忽然发生了很大改观，但为时已晚。历史的潮流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无可扭转。我认为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对的，但是革命家希望利用这一潮流，改革一切东西，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革命的逻辑压倒了改良的方案，这是当时历史的必然。

体育研究导航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

我国体育消费研究进展与前景

作者：程林林，胡承洪，张永韬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9-12

通过文献资料法系统地梳理了我国体育消费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包括体育消费概念界定及分类、相关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体育价值观念与体育消费观念的研究、休闲体育消费以及体育消费实证研究等内容，并对上述研究情况加以总结归纳，在此基础上对体育消费的本质定位、消费观念、消费行为研究、体育消费市场培育等方面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对奥动遗产观的理性思考

作者：赵海燕，孙葆丽，曹秀玲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13-16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和综合归纳等方法，探讨了奥运遗产的内涵及其历程、特点，对奥运遗产的内在核心和发展规律进行理性的思考。研究认为奥运遗产观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方向和坐标；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是奥运遗产观的基础和动力；奥运遗产观和奥林匹克运动在相互促进中科学、健康、有序的发展。

文章内容：1、奥运遗产观的历史演进：实物认识阶段（奥运专有财产遗产和专有权利遗产—早期的奥运遗产），影响认识阶段（奥运正遗产和负遗产—升华中的遗产），学科认识阶段（奥运遗产学—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2、奥运遗产观的特点：具体到抽象—奥运遗产内涵的升华，狭义到广义—奥运遗产外延的延伸，传统向现代—奥运遗产立足点的跨越，有形到无形—奥运遗产表现形式的扩展；3、重视奥运遗产观，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发展：奥运遗产观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方向和坐标，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是奥运遗产观的基础和动力，奥运遗产观和奥林匹克运动在相互促进中科学和健康发展。

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体系现存问题与对策

作者：邹本旭，孙永生，张睿，方海明，姜晓天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28-30，35

通过总结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对各培训基地在依据《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大纲》的基础上所开展的培训工作进行研究，针对全国各培训基地在培训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力求通过完善培训体系，加快培养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提高培训质量，进而加快我国全国健身计划开展的步伐。

“后奥运”时代武术散打发展战略研究

作者：姜传银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44-47

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后奥运”时代武术散打发展战略进行研究，认为武术散打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还存在诸多不足。为此，笔者认为，武术散打后奥运时代的发展战略是首先要组建专门的推广机构，在国内注重在学校的推广和普及，在国际上利用多种方式、方法促进武术散打的传播；其次，在推广策略上应转变观念，以武术散打推广为主，武术套路为辅；第三，进一步加强武术散打自身的改革，提高知名度和参与度，争取让武术散打早日进入“奥运会殿堂”。

中国武术与韩国跆拳道比较

作者：王国志，王岗，吴志强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48-51

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中国武术与韩国跆拳道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表明：尽管韩国跆拳道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是快捷和广泛的。但是，中国武术无论在历史背景、文化礼仪，还是在技术、技法方面都是韩国跆拳道所无法比拟的。

文章内容：1、积淀深厚的中国武术与文化单一的韩国跆拳道；2、注重方法的中国武术与追求招法的韩国跆拳道；3、中国武术礼仪的“修”与韩国跆拳道礼仪的“学”；4、传承缓慢的中国武术与传播迅速的韩国跆拳道；5、结论：韩国跆拳道在近近年来改头换面，打着“学跆拳道，体验中国武术精神”的旗号敲开了我国的大门，长驱直入。原来属于中国武术的“市场”正在被占领。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体育市场，更是其隐藏在背后的一种民族传统和文化自信的流失。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已经处在边缘状态的中国武术终将有一天被“驱逐出境”。因此，面对如此的现状，我们要给中国武术一个正确的定位，让武术走出“体育圈”和唯技击论的困惑，并把中国武术中的文化要素和民族精神最大化的挖掘出来，达到传承民族的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真正目的。这才是中国武术发展的正途，也是中国武术与域外武技抗衡时所体现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当我们的青少年对跆拳道痴迷甚至是疯狂之际，我们更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中国武术与韩国跆拳道的关系。不应对跆拳道的“韩流”盲目跟风，也不应对中国武术短暂的迷失而妄自菲薄。

体育概念定义的辩证批判

作者：王学实，戴萌，李倩

来源：《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10-16

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当前的一些采用实质定义方法定义的体育概念的种、属关系进行批判，指出部分学者在定义过程中将属于人的身体或心灵的部分抬高到属概念的层次，如此导致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错误，论证并提出体育活动的属概念只可能是“人的生活活动”、“身体活动”与“心灵活动”的质和量的差异，是辨别“体育活动”与“非体育活动”种差的方式。借助马丁·海德格尔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指出当前体育理论学者们在定义体育总概念时，从不同的视角将“体育活动”这一“存在”的社会现象向各自定义中不同的价值单一化为某一价值主体的价值，从而导致对“体育活动”作为人类共同拥有的“存在”的社会现象的多重精神和价值的“忘在”。论文最后提出了体育总概念的认识框架：体育作为总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概念家族，包括体育活动、以体育活动为中心的现实世界、体育人和观赏者四个基本范畴，体育活动处于这一总概念的中心位置，因为其他三个要素都必须通过体育活动而关联起来。

新中国体育 60 年发展战略重点的变迁

作者：夏成前，田雨普

来源：《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17-22

采用文献资料法，追溯了建国以来历年所发生的重要体育事件，并根据中央政府及体育主管部门所颁布的方针政策和相关历史文件，梳理了新中国体育发展战略重点的变迁轨迹，描绘了新中国体育发展战略重点高速轨迹的概要趋势，并指出，建国60年来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交织发展，交替成为战略重点，最终齐头并进，在高位实现协调发展。

二战后国际体育大发展对中国体育的启示

作者：张晓义

来源：《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23-26

从二战后国际体育大发展的现象入手，对其原因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解析其对新时期中国国际体育发展战略的启示，认为中国应制定新的国际体育发展战略，为中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服务，为建设体育强国服务，为构建和谐世界服务。

NBA 词汇的构词特征及其所折射的文化

作者：刘霓辉

来源：《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30-34

采取“数据收集和描述---数据分析和评价---数据整理”的三步策略，从英语构词法入手研究 NBA 词汇和 NBA 文化间的联系，试图总结出这些词汇的构词法特征，理清不同的构词方法和他们所折射出的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

结论：通过对 NBA 词汇、英语构词法和 NBA 文化的分析研究，NBA 词汇的构词特点以及 NBA 词汇、构词法和 NBA 文化三者间的关系如下：1) 每个 NBA 单词有相应的构词法构成，主要复合法和旧词新义的运用；2) 在使用不同的构词法创造 NBA 单词时他们所发挥的功能是不同的。而且不同的功能恰好对应着相应的 NBA 文化，这就意味着构词方法和它创造的单词所反映的文化间有着必然的联系；3) 每个 NBA 单词都承载着 NBA 文化。每个 NBA 单词有相应的构词方法；每种构词方法有相应的功能；每种功能反映出相应的 NBA 文化。总之，在使用不同构词法创造单词时所发挥的功能是不同的，每种功能反映相应的 NBA 文化、NBA 词汇承载 NBA 文化。

关于建立奥林匹克学的思考

作者：熊斗寅

来源：《体育科学》2010年第1期，74-79

建立奥林匹克学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继续坚持奥林匹克教育的需要。分析了奥林匹克学科建立的基本要素和理论基础，认为建立奥林匹克学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对于如何建立奥林匹克学提出了建议。

转型期我国社会体育利益整合机制研究

作者：刘玉

来源：《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7-11

转型时期我国社会体育利益分化明显，体育利益结构变化深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和谐发展，所以现阶段应该加强对社会体育利益整合机制的研究。考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体育利益整合机制应主要包括充足的主体动力、健全的体育利益保障机制、完善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合理的体育利益分配机制、多元的体育利益补偿机制。

文章内容:1、体育利益整合机制的内涵;2、转型期社会体育利益整合面临的主要问题:体育利益保障机制不健全,主体动力不足,体育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社会体育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社会体育利益补偿机制不完善;3、转型期社会体育利益整合机制的内容:建立实现社会体育利益的保障机制,提升主体动力,完善我国社会体育利益表达机制,改革社会体育分配机制,丰富社会体育利益补偿机制。

职业体育市场交易制度研究

作者:郑志强

来源:《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12-15

职业体育的市场交易制度是界定市场交易主体之间产权交换的经济制度,也是现阶段我国体育市场最具实施效率的制度。按照交易的签约顺序,进一步细分为签约前制度、签约时的制度以及签约后的制度三种。签约前的制度包括市场准入和担保制度;契约谈判制度主要是劳资谈判;契约签订后还必须通过复杂的制度加以保障,包括监督制度(共有联盟总裁监督、裁判监督和媒体监督三个层次)、激励制度、纠纷处理制度和保险制度等。

结论:针对我国目前职业体育市场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体育市场交易主体之间涉及产权交换的交易制度是最具实施效率的制度,有必要加快建设步伐。1、签约前的制度具体包括市场准入和担保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包括市场主体资格的实体条件和取得主体资格的程序条件,即交易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才能进入市场。市场担保制度包括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两类,人的担保主要指通过交易者的信用担保,物的担保主要指交易者在签约前必须缴纳一定款项作为担保。这两个制度是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关系的前提。“无恒产者无恒心”,这些制度将提高交易者的违规成本并有效减少其机会主义行为,这也是目前我国职业体育市场比较忽视的环节。2、职业体育最主要的契约谈判制度是劳资谈判。劳资双方形成了双边垄断的地位,谈判的结果取决于各方对谈判破裂的担心程度。职业体育劳资双方的垄断使劳资双方的谈判采取集体谈判来进行。劳资纠纷是导致各种赛场舞弊行为的导火索,显然,集体谈判是解决我国职业体育劳资纠纷的良好制度,因此加快运动员工作的建设并建立劳资集体谈判制度是化解劳资纠纷的有效途径。3、职业体育市场中契约签订后还必须通过复杂的制度加以保障其全面实施。这些制度是保障契约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包括监督制度、激励制度、纠纷处理制度和风险规避制度等。就我国目前而言,引进媒体监督,选拔优秀管理人员并提高其待遇,完善纠纷调节和保险机制等对改善国内职业体育市场绩效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现阶段影响我国城市青少年体育消费心理预期的因素分析

作者：赵江鸿，刘志强，邱红军

来源：《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26-30

就影响我国城市青少年体育消费心理预期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目的在于为改善和提高青少年体育消费心理预期，扩大体育消费市场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表明，影响我国城市青少年体育消费心理预期的主要因素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体育消费市场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同时，国家经济政策和消费者获取消费信息等因素也起重要作用。

文章结论：1、影响我国城市青少年体育消费心理预期的主要因素有家庭经济状况因素、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因素、体育市场环境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国家经济政策因素和消费者获取消费信息因素等6个方面。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且将随着我国经济状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2、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是影响体育消费心理预期的改善最主要因素，我国城市青少年个人可支配金额数量的不足，是导致其体育消费心理预期水平不高的直接原因。3、我国城市青少年表现出较强的体育消费需求，但价格过高，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劳务型产品服务质量差，健身指导专门人才缺乏，体育消费市场区域差别较大等因素影响了我国城市青少年的消费积极性。4、我国城市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和体育消费意识正在逐步提高，他们在重视物质消费的同时，对体育文化娱乐等精神方面的消费需求也有所增长，但仍有必要加强体育价值观念的培养。5、我国城市青少年在消费时主要依赖于个人经验，消费主体意识薄弱，自主选择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不足，消费信息传播系统不畅通，个人信息占有量有限，使之在消费过程中难于做出清晰的判断和理智的预期。

运动竞赛与训练学

我国男子健美运动员体能特征分析

作者：刘敏，李建英，相建华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67-70

通过文献法、专家访谈法、专家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测量了112名男子小级别健美运动员的相关指标，对运动员的体能特征进行总结分析，旨在通过对我国健美男子小级别运动员竞技能力指标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提高其体能水平以及为今后运动员的选材、训练提供一

定的理论参考。

文章结论：1、男子健美运动员的体能特征在比赛中所起主要作用，其中形态在比赛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机能、竞技能力素质特征均起着重要作用。2、男子健美运动员身高及长度指标略小；肌肉围度除腰围外均较大，表现为躯干呈倒三角；体脂百分数较小，身体的整体匀称度，与理想的黄金分割值差距较大。3、男子健美运动员血红蛋白水平较高，血尿素氮水平也较高，且高于其他项目运动员，血清肌酸激酶在不同健美运动员身上表现各异，血清睾酮在赛前有下降的趋势。4、力量是健美运动的基础素质，也是核心素质。男子健美运动员要求有较大的手臂力量、上肢力量、下肢力量和腰腹力量。

北京奥运会中、欧男子篮球交锋过程若干技战术指标对比分析

作者：张帆，杨改生

来源：《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77-82

采用文献法、录像观察法、逻辑分析法以及数理统计法对北京奥运会中中国男子篮球队与欧洲各国男子篮球队的比赛情况进行分析，找出差距，以求中国男篮在奥运会后能够认真总结，科学训练，学习欧洲篮球强国先进的运动员培养体制及训练方法，使中国男篮在国际大赛中击败更多的欧洲强队，在进入世界男子篮球前八名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

文章结论：1、中国男篮内线优势尚未建立起来，却又失去了小、快、灵的传统特点，在北京奥运会中，与欧洲对手相比，多项技术统计指标处于劣势，其中2分球投篮次数、抢断、防守篮板3项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2、中国男篮的篮板球的拼抢意识明显不足，4场比赛无论是进攻篮板球还是防守篮板球均输给了对手。3、中国男篮在本届奥运会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面对世界强队时，敢打敢拼，能够将自己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但由于队伍不成熟，处理关键球的经验不足，体能储备差等原因，没能将胜利果实保留到终场，失去了本该赢得的比赛。4、中国男篮在面对对手突然加强的紧逼时，失误过多。后卫和前锋球员很难通过自己的技术特点和有效的战术配合，打乱对手的攻击性防守，造成多次被对手抢断的不利局面。5、中国男篮在技术应用的抗干扰能力方面严重不足。

我国少年体操运动员关节损伤及预防研究

作者：杨继美，李贵庆，魏旭波，李裕民

来源：《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83-86

为了解我国少年体操运动员关节损伤状况并制定预防措施,为教练员科学制定训练计划提供理论依据,采用调节器查访问法、数理统计法、专家访谈法、文献资料法等方法对参加2008年全国少年儿童体操比赛的122名运动员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损伤部位主要集中在足部、膝关节、肘关节、腕关节、坐骨结节、股骨头等部位,且大多数为慢性劳损。为预防各种关节损伤,应加强训练中的医务监督,并根据运动员损伤特点合理高速训练计划。

学校体育学

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的现状分析

作者:魏本好,席玉宝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83-86

通过对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中学校体育场地情况进行统计与分析得出,目前我国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程度总体比较低。从不同类型学校看,其开放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其他学校、高等院校、中小学、中专中技学校。从区域上看,全天开放程度最高的是西部地区,部分开放程度最高的是东部地区,开放程度最低的是中部地区。从不同项目场地看,开放状况较好的体育场地主要是一些时尚类、非教学类的大众喜爱的运动项目场地。

我国高校体育教学改革30年回顾与思考

作者:吴忠义,高彩云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87-90

沿循历史发展的轨迹,回顾了30年来我国普通高校体育教学改革走过的道路;站在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对改革的历程和目前的现状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建构以人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校体育课程与实践教学体系的思路。

文章内容:1、体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教学目标理论与实践不完全一致,二是教学效果测量与评价不科学,三是教学改革重心偏移,四是课改试验事倍功半,五是理论研究缺少争鸣,六是教师管理导向错位。2、体育教学发展策略,一是理顺主体关系,调整教学改革重心,二是坚持实事求是,规范教学改革试验,三是倡导学术批判,促进教学改革争鸣,四是尊重学科特点,引领教师健康发展。

学校体育“人本”教育生态的偏失及补偿研究

作者：王晓均，张世威，王卫红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91-94

阐释了“人本”教育的生态观，建立了学校体育“人本”教育的生态指标体系，揭示了学校体育“人本”教育生态偏失的表现维度，即学生生命灵性、自由和创造活力的偏失；增进学生健康的偏失；教学内容贴近生活的偏失和尊重学生差异的偏失，进一步剖析了导致学校体育“人本”教育生态偏失的主要原因，即教育的评价体制；教学过程中的功利化和场地器材的有限性，并提出了构建学校体育“人本”生态的教育思想、“人本”生态的体育课堂、“人本”生态的自然环境等生态补偿措施。

新形势下我国高校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模式研究

作者：董众鸣，何志林，朱桂林

来源：《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108-112

分析了新形势下我国高校竞技体育管理体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基本特征。认为高校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发展，从政府主导型走向政府与社会结合型是一次体制创新，更是一次制度创新。指出新形势下我国高校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发展必须符合现代高等教育和高校竞技体育发展规律，建立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政府与社会结合型“三级”管理体制模式。

体育课程校本化实施成效及存在问题的研究

作者：董翠香，李兴艳

来源：《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113-116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经过8年的校本化实施，使体育教师课程意识得到了提高，促进了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使体育课教学走出封闭的“象牙塔”，推动了学校体育的整体发展，涌现出了各具特色的校本化实施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传统习惯势力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体育教师的课程意识与课程开发能力薄弱，缺乏体育课程专家的技术指导，盲目追求兴趣化、特色化，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

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简称“校本化课程实施”，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涌现出的一个新概念，是校本课程开发的组成部分。

影响我国高校体育教学发展的因素及对策分析

作者：甄子会

来源：《体育与科学》2010年第1期，109-112

通过对我国高校体育教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发现影响高校体育教学发展的因素有：教学管理水平；教学指导思想的确立；教学内容的设置和教学模式的使用；体育教学考核与评价体系；体育教师的素质；教学环境等，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以期为我国高校体育教学的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依据，使高校体育教学能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人才。

文章内容：1、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教学发展存在的问题：高校体育的改革工作未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高校体育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缺乏创新观念，高校体育教师各方面的素养仍有待提高，体育教学设施的配置仍有待完善，体育教学评价内容与标准过于单一。2、影响我国高校体育教学发展的因素：教师的教、学生的学、教学评价、社会、文化、人际关系、教学资源、现代手段等因素都在影响着教学。对这些因素能起协调作用的，就数体育教学管理工作了。体育教学管理水平是影响我国高校体育教学发展的首当其要因素。3、我国高校体育教学发展的策略：提高学校体育教学管理水平，确立正确的体育教育观，重视体育课程的更新与教学模式的创新，考核评价方式的构建要起到激发体育兴趣的作用，提高高校体育教师的结合素养，优化高校体育教学环境。

美国健康体适能课程模式在我国普通高校的实验研究

作者：王亚立

来源：《体育与科学》2010年第1期，104-108

采用对比实验为主要方法以我国高校的普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选用美国健康体适能课程模式对其进行教学实验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健康体适能课程模式对提高大学生心肺功能、肌肉力量和柔韧性等有积极影响；美国健康体适能教学模式对培养学生的体育观念和体育意识，对学生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有着广泛的影响；美国健康体适能教学模式是我国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它把科学健身的理论与方法融为一体，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激发学习动机，使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更加喜爱体育课；美国健康体适能教学模式在我国普通高校的实施中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对此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我国体育课程的改革提供参考。

文章结论：1、实验表明美国健康体适能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心肺功能、肌肉耐力和柔韧性等的提高均有显著效果，这些测试项目也是人体适应外界环境必备的能力，也就是说通过

健康体适能教学模式使学生的体力更加充沛,预防疾病的能力增强了。2、美国的健康体适能教学模式在我国普通高校的实验研究,对培养学生的体育观念和体育意识,对学生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有着广泛的影响。实验表明,通过健康体适能教学模式使学生的学习成绩提高了,学生的表现力、自信心、锻炼的自觉性、体育意识增强了。让学生树立自信心,展示自己的优点,发展个性,从而调动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3、健康体适能教育模式是以健康体适能的理论为依据,在学生掌握动作技术、技能的同时,全面提高学生的健康体适能水平,是对传统健美操教学模式和方法的进一步完善,更好地适应了体育教育发展的要求。它把科学健身的理论与方法融为一体,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激发学习动机,使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更加喜爱体育课,同时也弥补了我国体育教学指导思想中忽视学生个性发展的不足,为我国体育课程改革提供参考。4、美国的健康体适能教育模式着重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和自信心,我们应汲取其精华为进一步深化体育课程改革服务,与我国《体育与健康标准》终身体育的个体化的目标相吻合。

文章建议:1、纵观各体育思想的特征,素质教育下的“终身体育”和“健康第一”思想还将继续主导未来我国体育教学的发展。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分析其内涵,结合本国国情,学习他国体育模式的精髓,改善教学形式,优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更好的为我国的体育教学服务。2、健康体适能的教育模式的核心内容是与健康有关的知识和方法,我们应重视理论教学对提高学生对体育认识的重要性,让学生生活在一个健康体适能的教育氛围中,在体育课中能够学习运动知识,享受运动过程,也愿意从事更多的身体活动以提升体适能,并具有正解的态度能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以便终生受益。3、美国的健康体适能教学模式在我国普通高校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如体育理论的内容有待于进一步发丰富,改革旧的教育模式,用多样的方法、形式、手段来丰富教学内容,加快教学手段和方法的现代化进程。

“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专题

论体育强国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任海,王芳,赵卓

来源:《中国体育科技》2010年第1期,3-9,18

从体育强国国际影响力的概念出发,分析这一概念的特点,将其界定为体育强国在国际社会中运用自己,包括体育在内的国家实力去影响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意愿和作为的能力;回顾并分析了历史上诸体育强国之所以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因,进而提出了中国由

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应当以促进世界体育发展的多样性为基础构建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这正是国际体育的整体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的结合点。最后，阐述了中国促进世界体育多样性应采取的策略。

文章内容：2008年，中国成功以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并在这届奥运会的体育比赛中取得前所未有的辉煌成绩，第一次在金牌数量上起过美国，居于金牌榜之首。北京奥运会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中国体育在当代国际体坛中取得新的位置，在与世界体育接轨的国际化道路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新的目标是实现由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转变，这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型，需要立足长远，全面谋划。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构建体育强国，不仅要促进中国自身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要对当代国际社会有所影响，使之朝着有利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方向发展，于是，需要将体育强国的建设置于国际社会和国际体育发展的全球视野下。而从全球视野审视我国的体育发展之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体育强国的新视角，即从国际体系的层次，从国际影响力的角度来看什么是体育强国。

提高中国体育国际影响力的策略：在包容与和谐中促进国际体育格局的更新，继续发挥国际体育既有框架和秩序的作用，因势利导推动国际体育改革，促进非奥运项目，提高国际体育容纳度，在国际互动中强内固本，拓展并改善传播渠道。

体育强国指标体系的创建

作者：邱雪

来源：《中国体育科技》2010年第1期，10-14

北京奥运会后，如何实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宏伟目标，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应该看到，体育强国的核心指标是体育强国的关键，就如何建立“体育强国”指标这一问题，通过文献资料调研、问卷调查法等形式对体育强国及其相关指标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得出了动态论及强国结合评价体系等相关结论。

文章结论：1、“体育强国”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综合的概念，它会随着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变迁，而它所包含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大的差异。2、在各个历史时期，体育强国及其评价体系都应该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总体发展水平为背景，以体现出我国体育事业客观发展水平为宗旨。3、体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是以体育强国综合指标为主的，包含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3项指标的综合指标体系。

“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提出的由来与涵义的演进

作者：曹守和，赵玉梅

来源：《中国体育科技》2010年第1期，15-18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采用文献资料调研和比较研究方法，对“体育大国”“体育强国”提出的由来与涵义的演进，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结果认为：“体育强国”与“体育大国”这两个词汇，严格来说都是外来语，而且两者的涵义是动态的；体育大国的涵义最初与体育强国相似，后来主要是指奥运会上或其他国际大赛中的金牌数量；“体育强国”涵义的演进经历了“奥运会上名列前茅”、“奥运会上名列前茅为主”、“奥运会上名列前茅、基础性大项的水平与其他世界大赛的成绩”、“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群众体育发展水平为主”几个阶段。

文章结论：1、“体育强国”与“体育大国”这两个词汇，严格来说都是外来语，是从外国人的文章或讲话中翻译过来的。因此，人们的理解见仁见智，容易产生歧义。2、“体育强国”与“体育大国”的涵义是动态的，其中的强弱、大小与外部（国）情况变化有关，涵义的具体内容与内部（本国）社会和体育的发展变化相关联。3、“体育大国”的涵义最初与“体育强国”相似，后来虽然有些扩大，但变化不大，主要是指奥运会上或其他国际大赛中的金牌数量。4、“体育强国”的涵义演进经历了“奥运会上名列前茅”、“奥运会上名列前茅为主”、“奥运会上名列前茅、基础性大项的水平与其他世界大赛的成绩”、“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群众体育发展水平为主”几个阶段。5、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现阶段“体育强国”的涵义，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讨和交流。

我国群众体育由大到强的战略研究

作者：刘新华

来源：《中国体育科技》2010年第1期，19-31，48

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对比研究、数理统计等方法，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成就，并就芬兰、日本和我国大众体育的现状进行对比分析，找出我国目前群众体育发展的的问题，提出我国群众体育由大到强的建设目标、任务和措施。

文章内容：1、我国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及面临的主要问题：（1）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群众体育蓬勃发展，城乡居民健身意识日益增强，群众体育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全民健身组织网络日趋完善，法规制度逐步完善，法制化水平不断提高，群众体育工作队伍日益壮大；（2）当前我国群众体育面临

的主要问题：中老年人体质水平有所下降，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令人堪忧，城乡、区域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较为明显，缺乏体育锻炼场地设施和健身指导，基层群众体育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群众体育事业需要。

2、芬兰和日本的社会经济与大众体育发展特点：(1)芬兰社会经济与大众体育发展特点：芬兰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和特点是，综合制定体育政策，鼓励国民参加体育活动；依靠社会运营管理，调动基层组织开展大众体育活动的积极性；重点建设体育设施，创造大众体育开展的良好条件；志愿者的无私奉献，推动大众体育广泛发展；发挥大众体育优势，积极应对社会老龄化。(2)日本社会经济与大众体育发展特点：制定体育振兴政策，全面发展大众体育；建立系列制度法规，保障大众体育高效发展；提高基层队伍素质，发挥体育社会指导员的推动作用；关注老年人群健康，积极开展老年人体育活动；联结学校、家庭、社区，创建儿童青少年良好的健身环境；开展休闲体育活动，实现大众体育生活化。

3、我国群众体育由大到强的建设目标、任务和措施：(1)大众体育强国的建设目标任务；(2)建设大众体育强国的对策措施：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改革，逐步实行群众体育社会化管理；加快群众体育法制化、制度化建设，为群众体育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加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管理，夯实群众体育发展基础；开展休闲体育活动，发展全国健身服务产业；加强学校内、外体育互动，培养学生终生体育锻炼习惯；缩小城乡、区域、阶层差距，促进群众体育全面发展。

关于体育强国战略若干问题的思考

作者：刘一民，赵溢洋，刘翔

来源：《中国体育科技》2010年第1期，32-36，57

为探索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之路，运用文献资料调研、逻辑分析等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体育强国战略进行研究，分析了体育强国概念内涵及特征，初步确定了体育强国指标体系基本框架，提出了体育强国战略目标及“两步迈进”构想和小康体育阶段5个领域发展战略选择。

文章内容：1、对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体育强国战略的反思。2、“体育强国”概念的内涵及主要特征：主要特征有，大众体育普及程度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强，学校体育受到政府重视，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体育软实力强。3、体育强国指标体系基本框架：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体育软实力。4、体育强国建设实施“两步迈进”的战略思路：(1)战略目标：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体育强国目标；(2)战略步骤：实施“两步迈进”计划；(3)小康体育阶段的战略选择：——大众体育：追赶，——竞技体育：保持，——学校体育：加强，——体育产业：扩大，——体育软实力：

提升。

《信息导航》2010年第1期 总第12期

主编：冯琴

编委：夏文华 吕艳华 田卫方 程萃文 杨艳燕

主管：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主办：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地址：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业务楼一层

邮编：041004

电话：(0357) 2055679

E-mail: tsgckzx@163.com

出版时间：2010年3月